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09 年 7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shrbooks@gmail.com。
- 6、以往各期独立阅读均可在独立阅读网下载：<http://chinairr.com.cn>。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汪伟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文学：朱 白（广州）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晓骥（北京）、张无极（北京）、朱航满（河北）、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

翻译：陈丹丹（南京）、吴万伟（武汉）

编者按：

《独立阅读》已经坚持了两年时间，在此应该感谢读者、撰稿人和技术人员。办这份电子刊物的初衷是满足少数人交流读书心得的需要，既然公之于众，就不得不拟定若干简要的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已经见之于刊名。独立是我们两年来努力追求的主要目标。

《独立阅读》诞生于网络时代，到目前为止，一切相关工作建立在自愿和免费的基础上，符合自娱自乐的初衷和底色。至于自我定位为“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也并非事先要求的结果，而是逐渐形成的性格，其间得失，读者可鉴。

阅读的目的是求知，写作的目的是交流。让我们继续。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 白
朱航满
思想：成 庆
文史：王晓渔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严 飞：香港，成为我的香港
孙骁骥：吃得民主，吃得自由

书评

成 庆：沃格林：探究灵魂的哲学家
孙传钊：隐现的问题——重读《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
刘伟伟：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论视角
羽 良：山寨国

声音

马慧元：克莱本钢琴比赛DVD杂记

独立阅读两周年

朱 白：内心安定，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王晓渔：趣味的雅集
成 庆：阅读的公共性
言 一：微物之光
苏小和：从独立阅读开始
严 飞：读书之叹
刘 柠：书评、书业与《独立阅读》
孙骁骥：去往公民社会的旅行
凌 越：我和“独立阅读”
陈丹丹：分享
罗四鸽：有一搭与没一搭
汪 伟：为交流而写作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100 多年来, 中国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制度变迁, 过去的 30 年, 制度的探讨和分析更是八面来风。某种意义上, 我们一直处在一种事关制度的迷茫状态, 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增长, 中国社会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而另一方面, 我们却在制度建设的问题上, 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阐释。奥地利学派关于人, 行为, 规则制度的理论资源, 就成为我们的一种重要的解释工具, 并有可能是一种有着特别比较优势的工具。因为在奥地利学派丰富的制度比较研究框架下, 人们能够对市场、法治、自知、宪政等制度机理有更加充分的理解。而在细分的层面, 奥地利学派所发展出来的信用货币理论、制度理论、企业家理论、知识理论、普通法理论、商人法理论、宪政理论, 无疑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经济, 社会, 具有醒目的提醒意义。

比如眼下, 这个国家的空气中似乎都漂浮着人民币。地价不可思议地疯长, 楼市继续高走, 天知道谁在这个时候还有勇气、有能力买得起房子; 股市的狂飙更是牵动着那些在不久前深深套牢的人们, 他们应该认为, 翻身得解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按照教科书的解释, 这应该是经济景气增长之后的必然反映。但是, 谁都知道我们的经济运行遇到了大问题, 国际市场萎缩, 内需市场苍白, 大量的工厂坐等观望, 没有谁敢在这个时候大投入, 大生产。我听说很多企业面对银行上门推销贷款, 纷纷婉言谢绝, 理由很简单, 产品没有销路, 生产就是亏损。

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的政府本着刺激经济的目的, 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发放贷款, 强大的流动性正笼罩着这个国家。一个近似于荒谬的现象正在形成, 大量的私人企业把银行主动送来的贷款当成了烫手山芋, 而那些中央企业必须服从领导意志, 不得不接受大量贷款, 并转身将这些巨量的资金投入到了楼市和股市之中。

某种意义上, 这正是眼下楼市股市非理性增长的最大缘由。“央企属性”才是眼下经济数据的本质。我们能看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有企业, 有实力有胆量炒出 40 亿的地块天价, 同样我们也能看到, 此轮股市飙升的领头羊, 正是那些财大气粗的中央企业。中粮集团花大价钱成了蒙牛的老板, 中海油再次发力, 要在世界各地占山圈地。中央企业成为经济危机下最凶猛的推动机器。

可是我们要问两个简单的问题: 第一, 这些看上去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 真的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么, 他们的种种行为, 是不是一个泡沫? 第二, 高达 10 万亿美元的贷款流入市场, 意味着货币发行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需求, 这会不会直接导致在接下来的时间内, 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强度通货膨胀?

在这里我想提醒那些正在或者打算疯狂炒楼炒股的人们, 本次“央企属性”名义下的楼市和股市, 所有的涨跌, 其实都在政府手心之中, 所以, 你们须谨慎, 政府有能力炒起来, 当然有能力冷下去; 另一个更重要的提醒是, 巨量货币增发, 将会直接导致通货膨胀, 你们手中的钱将会迅速变得很不值钱。

关于通货膨胀, 说来很简单: 通货膨胀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 以及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比如说米塞斯、哈耶克, 就坚持这种基于货币的通货膨胀解释理论。按照这种看法, 所谓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得太多了。可以这么说, 从技术意义上说, 就是中央银行发行了太多的货币, 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太多了。

有意思的是, 我发现, 官员们在这个时候并不承认通货膨胀的现实性。他们会沿用物价主义和简单的 CPI 指标来定义通货膨胀。正是在这里, 奥地利学派的意义得以凸显。按照米塞斯的理论框架, 一个权力无限大的政府, 必然缩小市场的容量, 而最后的结局就是, 政府职能依靠行政指令来刺激经济的发展。

这是很多中国人熟悉的格局, 计划经济、长官意志, 大跃进, 等等, 都是政府过于庞大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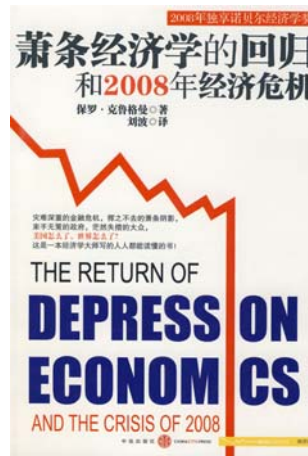


米塞斯

不过话又说回来，一群读书人在这里分析通货膨胀，显得有点杞人忧天。我们的存款少之又少，我们没有多套房子压在手上准备出售，也没有大量的闲钱去炒股，如此，我们在这里就只能翻翻闲书，隔靴搔痒。刚好，最近我盘点了一下今年上半年的经济类图书，把我认为有一些阅读价值的书罗列了一下，并简单写了几句随感，供大家一笑吧。

1、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 2008 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 年 3 月。

感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他在今年 5 月份的中国之行，于我是受益匪浅。这当然是一本试图扫描经济危机历史的书，从上个世纪初期的美国大萧条开始，作者的分析黄扫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挖出日本的病灶，然后又嘲笑了东南亚金融风暴的短视与愚蠢。一直到今天，这场仍然在蔓延的经济危机，成为克鲁格曼的最近关注案例。



2、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年 4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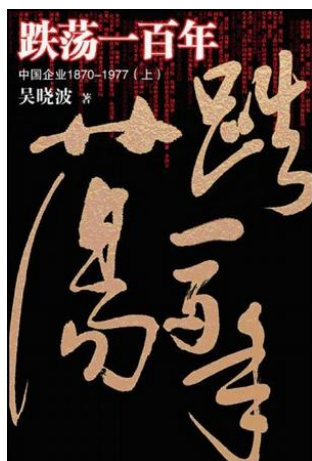
到目前为止，我所能读到了关于美国大萧条最令人信服的学术解释。可惜的是，当我们的世界在今天再次面对金融大危机的时候，几乎所有的政府再一次将罗斯巴德的观念置于脑后。某种意义上，先知总是遭到冷遇，人们习惯了在错误的道路上继续游走，那是一种惯性，也是一种懒惰，更是一种无知。

3、保罗·海恩等：《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年 5 月。

这是一本在中国大陆能够多次印刷的纯粹经济学教材，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读到的最容易读懂的经济学教材。我愿意把这本书当成经济学的范本，也愿意把它当成我进入经济学世界的通路。沿着这条通路进去，你会发现，经济学世界竟然是如此优美。而在应用的角度看，这本书再一次让我能够站在理论勇气的高度来看我们自己的经济，尤其是观察政府和市场的分工问题。

4、陈志武：《24 堂财富课：陈志武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 年 7 月。

陈志武教授的这些系列文章，在他慢慢写作的过程中，我就不断阅读，并自认为心领神会。在这本书里，个人权利和自由竞争，仍然是志武反复诉说的主题。也就是说，只有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充分倡导自由竞争，真正的可发展，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才有可能达成。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与其说志武教授在和他的美丽的女儿谈商业模式，不如说是在对每一个当代中国人进行经济学启蒙。



5、吴晓波：《跌宕一百年（上）》，中信出版社，2009 年 1 月。

今天看来，吴晓波的系列写作，从一开始，就有了历史梳理和当下承担的双重写作高度。读晓波的书，不仅读到他飞扬的文笔，还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由此，这样的书一时间洛阳纸贵，就是一件容易理解的商业阅读现象。

6、爱丽丝·施罗德：《滚雪球：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中信出版社，2009 年 1 月。

没有谁最终拥有财富，我们仅仅是财富的管家。巴菲特世人瞩目的财富人生，由他自己来书写，而不是由那些看热闹的作家来代笔，事实上是在向所有人呈现这样的道理：作为一个有财富管理大智慧的人，巴菲特一直在拼命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

7、傅国涌：《大商人》，中信出版社，2008 年 10 月。

傅国涌一直以历史梳理见长，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历史。这次他把兴趣点放在商业史上，其价值在于，他让那些泛着铜臭味的商业故事拥有了一层人文意义。我个人认为，这对那些仅仅知道企业战略，资本运作的财经写手们，是一种提示。

8、贺雄飞：《经济学的香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 年 5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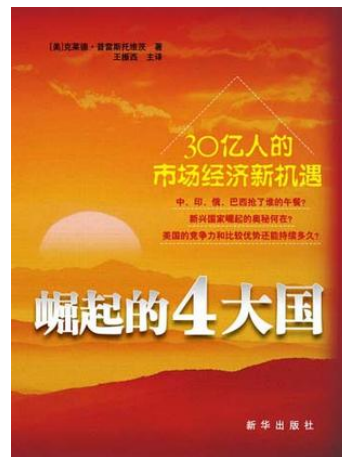
贺雄飞编书趣味高雅，我至今还感激他编辑的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他的这本《经济学的香槟》更是让我眼睛一亮。犹太人向来生存环境恶劣，在沙漠和对手的包围中，却能找到流淌奶和蜜之地。由此，犹太人对经济的敏感，对财富的敏感，就是神的一个启示。

9、彼得·德鲁克：《管理新现实》，东方出版社，2009 年 3 月。

很多人把德鲁克仅仅理解成一个企业管理专家，用他的工具理性遮蔽掉更加宝贵的价值理性。事实上，和所有的学问家一样，德鲁克终身追寻的，正是具有价值意义的思想，是人类的自由理性。所谓新现实，就是在这样的高度形成。

10、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崛起的 4 大国：30 亿人的市场经济新机遇》，新华出版社，2008 年 6 月。

我是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崛起的所谓四大国，或者是叫金砖四国。没有全球化的浪潮，这些所谓的崛起并无可能性。外部的拉动一直是人类现代史的主旋律，那些古老又闭塞的国家，指望内生的发展力量，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失败。问题在于，当全球的财富流动正在重构的时候，那些后发国家如何承担起人类继续发展的责任，这正是本书思考的来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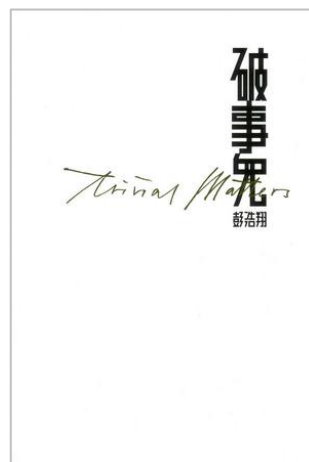
ESSAY&STORY 散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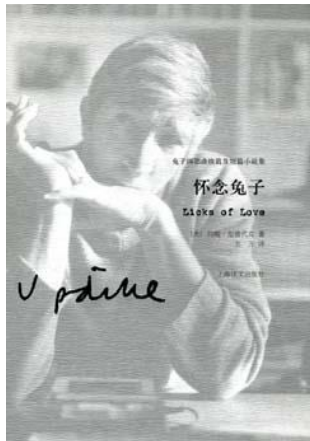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最近在翻一本老书，《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明争暗斗》（安东尼·亚瑟著，苗华建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 年 10 月），总觉得里面文人之间的讥讽、藐视甚至攻击，非常有趣，至少他们展示了一种不媚俗的“道德关系”。跟明争暗斗的美国作家相比，我们的作家则不仅仅是显得过于四平八稳了，而是营造了一种“文人相媚”的庸俗气氛。那么多庸俗的腰封、肉麻的推荐语就是证明。

文坛上的竟是些破事儿，虽然我没有站在圈子中里，也已经能够感受到那种紧张的、逼仄的、令人生厌的世俗气味。当然，不仅仅是文坛，我们的生活也都是些破事儿，因为从本质上，你我身上发生什么惊天动地大事儿的概率大概为零，在香港导演彭浩翔看来：“尘世有几许可堪动地惊天，还不是去似微尘，十八段吊诡异色小故事，所有种种，回头看看，就那么回事，爱与生死，也不过是些破事儿。”出现在《破事儿》（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 年 6 月）中的十几个短故事，都是彭浩翔多年来的一些电影之外的创作，这些故事都非常有趣，既不乏可读性，也不缺少那种突然击中你的灵光一现。都市里的年轻人本来就轻浮，他们在彭浩翔的轻松叙述下，又难免再多一层轻薄的外衣，他们花哨而又精致地编织着都市里爱欲故事。

我觉得有些书，适合放轻松来看，不必太计较所谓的文学性啊、技术啊那些东西，原始的阅读快感最重要了，不能抱着审问的姿态而忽略这些最原始的快感。在我看来，《寻人启事》（李承鹏，万卷出版公司，2009 年 5 月）就是这种具有原始阅读快感的小小说。作为足球记者，李承鹏曾经让人过多地看过那种轻浮而又幽默的文笔，我甚至怀疑过，这样一个擅长写俏皮话的体育记者会写小说吗？事实上，这本《寻人启事》在不缺少可读性的同时，也真的是做到了让人不停地发笑，非常开心地笑，这时候你就不能不承认有时候说俏皮话也是一种本事。我估计李承鹏是一个收集和经营俏皮话的爱好者，而且在这个事儿上他还非常敬业和专业，把俏皮话巧妙而不生硬地运用到自己的故事里，显得非常在行。跟那些为了俏皮话而生产出来的故事不一样，《寻人启事》的故事有点悲伤，悲中带喜的优越感和自卑感，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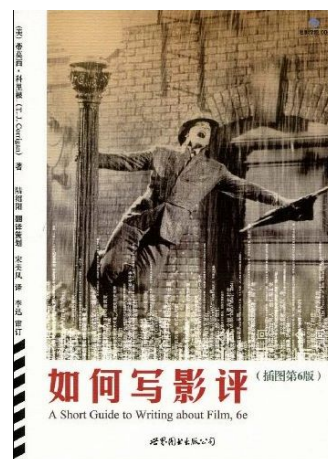
怀信心的同时又沮丧无比，这就在当代中国人浮躁的内心中有了一种必然的生长空间。

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一出再出，我喜欢现在这个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包括最后一部《怀念兔子》，五本放在一起非常有层次感，以作者头像作为封面，他们越来越老，随着兔子的故事作者也在感受冷暖人生。这部充分并美好地表达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百科全书”影响一些爱好生活的人，厄普代克轻松幽默的文风，也影响了中国作家凡事必“沉重”、“史诗”式的写作，至少他让人知道，原来轻松地表达也是如此重要和舒服。

最近电影院的大片连番上演，《变形金刚2》之后又来《哈里·波特6》，这让我们一面感慨美国电影和商业文化的强大，又一方面想着赶紧钻进电影院去享受炎炎夏日里那份清爽和劲爆。但不知道我们的影评人吃错了什么药，为什么会对《哈利·波特6》这样已经趋近完美的大片还会感到不满，“……堆砌出了这部沉闷的视觉奇观电影”——我以为这

句话里作者最想说的其实就是一句俏皮话，即“视觉奇观”，大家都知道这是当年被用来挖苦《无极》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反讽般地用在这样一个有逻辑、有剧情，甚至人家还有传承的好莱坞大片上合适吗？虽俏皮，但是为了用而用，没劲。

“我真怀疑《哈6》是一个该退休又赖死不走的老年食死徒拍的。”——你是看腻了，还是觉得人家沿袭的太多呢？有点传承、有点沿袭，这有什么不好的呢？中国人就爱瞎革命。从诚实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影评人出了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放下心中的抱负坦诚地来欣赏一部电影呢？你都赶时髦般地在首映之际就钻进电影院，难道是要去寻找价值观或者社会理想吗？视觉奇观不好吗？就非得阴阳怪气地折磨自己一下才爽吗？搞不懂啊，我们的影评人。从最基本的审美和客观事实出发，我们的影评人是不是也要学学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了？推荐一本《如何写影评》（蒂莫西·科里根著，宋美凤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8月），这本书不仅教你从初步开始写作电影评论的常识和必修知识，还让你从头就保持一些好的习惯，比如尊重常识、基本审美等等，还有如何将自己的艺术直觉更好地用文字表达清楚等这些浅显但确实重要的东西。比如科里根在讲述文章的“语调”时说，“讽刺、幽默或者愤怒在塑造一篇动人且有说服力的文章时，是最没有效果的”。从铺天盖地的报纸和杂志来看，我们的很多影评人已经全然不管这个“语调”问题了，他们极尽挖苦之能事，甚至为了俏皮而俏皮，讨回来的，我以为只能是一个“轻浮”而不负责任的影评人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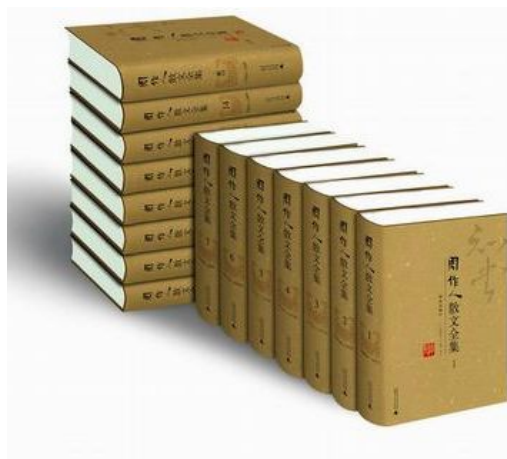
我觉得从一个影评人的话题可以引申出很多目前存在的问题，比如这些为娱乐产品打工（写影评、写娱评）的人其实都不是什么专业人士，他们甚至可以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当发生一些诸如 Michael Jackson 去世等突发事件时，被编辑拉来强迫其写一篇“散文”，这种既不专业也缺乏常识的写作，我们看到的效应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去违背常识和践踏人类起码的情感。比如刚刚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那篇臭名昭著的《迈克尔·杰克逊和我们时代的精神贫困》就是一次集中的表达，之所以会招致那么的网友甚至包括非 Michael Jackson 粉丝的不满，除了作者不尊重最起码的人类情感和违背常识以外，还有就是作者根本就是一个对大众文化漠视、对流行音乐无知的人，怎么就要对一个跟自己完全没关系的事情发言呢？难道我们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真的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可以任意驰骋在各个领域的超级健将了吗？更不明白媒体编辑为什么会找来这样一个人，来写这样一篇混乱逻辑、混蛋观点的文章。所以从头开始尊重常识，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人，也就是恰当的人做恰当的事，还是非常重要。这就像你不能找你那文盲的爹来点评一下你那字正腔圆的伦敦英语是否地道一样，关键时刻看完资格，还得看资历，别乱过界，那样容易闹笑话。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特约撰稿人 朱航满(石家庄, zhm7976@126.com)

钟叔河先生编校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历时五年终于出版了, 此次面世的版本几乎收齐了周作人现存的全部文字, 且首次按照时间顺序编排, 经过细心的文字考订, 全部注明了文章刊载时间及出处, 此可谓是一件功德善举, 这对于那些喜欢知堂文字的读者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好消息。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这套全集定价高达两千多元, 总共十四卷, 精装, 平均每卷近二百元, 网上不少书友已经在集体声讨出版商之离谱了。这也让我这个知堂迷失望了不少, 不过稍感意外的是, 因为钟先生的这套全集出版, 以前很难一见的同样由钟先生编选的十卷《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8年9月1版), 此时却大量出现在书店中打折销售, 用不到二百元就可以将这套同样精装的周氏文集抱回家中了, 这对于我等无疑又是一个好消息。如此, 关于知堂的文集版本收藏, 除此之外, 舍下已有河北教育

出版社由止庵校订的《周作人自编文集》, 共三十四册; 天津教育出版社由舒芜编选的《知堂文丛》, 共四册; 花城出版社由止庵编选的《周作人集》, 共两册; 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钟叔河编选的《知堂书话》和《知堂序跋》, 以及其他各类版本的零散周作人文集还有若干, 这里不再罗列。诸如我这样的并非版本意义上的收藏家, 其实仅有一套知堂的文集便足够了, 但因为对于知堂文字的兴趣日益浓厚, 也就难免爱屋及乌了, 而我另外一个趣味便是对于不同的版本的阅读, 可以引起足够新鲜的阅读欲望, 诸如这套一直期待的《周作人文类编》, 便成为近来自己消暑的良品。尽管今年本城气温已经超出历史记录, 每日在斗室中汗流浃背地读上几篇知堂文字, 却也有不亦快哉之感!



谈起周作人的散文, 其实近些年来在散文创作中隐隐地呈现出一种延续的文章命脉, 记得学者孙郁曾有过详细地梳理, 所罗列的作家就有张中行、黄裳、谷林、钟叔河、陈子善、刘绪源、止庵等等诸位, 而我近来读河南作家何频的随笔集《看草》(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年3月), 觉得也应将其列入这样一个隐默的文章谱系之中。《看草》为何频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一年来在中原观察草木枯荣的文字, 虽是记录自然风物的笔记文字, 但其中却隐藏着一位读书人对于所生存世界的态度, 均通过他的读书、交友、访古、问学等片段文字传达了出来。因此, 这些看似散漫的文字, 其实却是有着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关怀, 这也让我想到周作人对于自己文字的评价, 他总是感慨自己的文章其实是太积极了, 因为那些枯涩的文字其实犹如拥有强烈生命力的寒枝, 他们在真正的读者心中是枝叶繁盛的。在何频的日记中, 我多次发现有关知堂著作的购买、阅读和思考的片段, 而他的这些关于花草的文字也颇得知堂文字的神韵——细密、干净、自然, 乃是当下日益浮躁的文字中少见有气象的。

我起初对这册《看草》的关注缘于书装的美丽, 书是去岁在北京所购, 在书店里发现它装帧高雅大方, 特别是内文的版式设计别出心裁, 以日记卡片的形式出现, 配以作家的自绘插图, 再读文字颇觉表里如一, 是可读、可赏和可藏的好书。我特意注意到此书的设计者为刘运来先生, 后来在网上查阅, 果然不出所料, 此书终获 2008 年中国最美的图书称号, 能遇到刘运来先生这样的美术编辑, 真是作家之幸, 也是读者之福。而我近来读冯骥才先生的文集《散花》(山花文艺出版社, 2009 年 5 月), 也是因为其设计和版式优雅的缘故, 此书被设计者制作成为一个类似红色盒子的样式, 打开右侧的折页, 还可以发现设计者十分巧妙地在折页上放置了一张书签。而如冯骥才先生所表白的, 这册文集的文字是自己近年来随心所写, 因为极为喜爱天女散花的文章境界, 便有此命名, 也因此, 设计者在书封、书脊以及书签上采用了佛教中的线描花朵, 使得整部著作显得分外的典雅和尊贵, 气派甚是不凡。假若我来评选 2009 年中国最美的书, 我愿意投此书一票。《散花》收集了冯骥才先生近年来创作的三篇小说和部分随笔、杂感、序跋等文字, 并配以作家的近二十副绘画作品, 使得此书读来让人赏心悦目。而书中内容令我慨叹的是冯先生对于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寻访和保护

的诸多篇章，记录了他在四川、内蒙古、山西、河南、江苏等地寻访年画、剪纸、古村落等所做出的努力，其间的甘苦辛酸原非我所想象的那么浪漫，诸如他在《精卫是我的偶像》中写到为了筹集关于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资金，数次进行画作的义卖，甚至将自己最珍爱的两副画作也出售了，尽管这些资金对于保护整个中国的民间文化遗产是杯水车薪，但却如他在回答记者的疑问时所说那样让人敬佩：“精卫填不了海。精卫是一种精神。一种决不退却、倾尽心力乃至生命的精神。我尊崇这种精神。它是我的偶像。”这让我想起当年建筑学家梁思成与他柔弱美丽的妻子林徽因在时局艰难中奔波在荒僻的乡村，寻访和保护那些属于我们民族文化的精神财富。

几年前，作家野莽曾经策划过一套“当代才子书”，要求入选者必须兼具诗、文、书、画，最后选定为汪曾祺、冯骥才、贾平凹和忆明珠四位，除了最后一位不甚了解外，前三者称呼为当代才子，按照野莽所定标准应该合适，无疑这是一个很有眼光的策划，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它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对于中国文人尺度的一种回归，我以为这不是简单的士大夫名流的所谓雅趣，它更重要的显示一种中国文化的精神趣味。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回到五四时代，那些英姿勃发的知识分子其实也并非只是单一化的形象，诸如鲁迅先生，他对于版画的衷情，对于书法的精湛，对于毛边书的偏爱，对于电影的迷恋，无不显示出一个中国文人的本色来。从这样一个意义上来讲，当下的中国文人相差甚远，因为连玩都玩不出境界和水平来。而野莽所列举的这几位中国作家，在写作之余却玩得风生水起，各成气候。引起我的这些感慨的是因为上面所读冯骥才的《散花》，还有就是贾平凹的散文集《静水深流》（河南文艺出版社，2009年2月）。我已久不读贾平凹的著作，何况这本文集中所收录的三篇长篇散文《我是农民》、《老西安》和《西路上》以前也都读过，且印象颇深。而这次又读此书，实乃是因为这书的优雅美丽，在贾平凹的文字中配有其书法和绘画，也可谓是相得益彰。此书软精装，书封红色剪纸上有着贾平凹个性十足的书法题签，整体效果颇有汉唐气势，华丽、粗拙、大气。



一个文化大师最终必定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藏，而不是单一的文字传奇，甚至连他的八卦奇闻都是那么充满魅力。如此，且来再说说汪曾祺。作家苏北的《一汪情深：回忆汪曾祺先生》（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4月）就记录了当代文坛上一个让人称奇的佳话，二十多年前，安徽县城里的一个叫陈立新的青年职员因为偶然读了汪曾祺的一册文集《晚饭花集》，爱不释手，于是将此书全部抄在了四个日记本上；后来这位青年又到汪先生的故乡高邮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回来后就将自己的笔名起为“苏北”，以示自己对于汪先生的爱慕。之后的二十多年，他一直追随汪曾祺，这本著作就是一个最完整的见证。此书中除了记录有关作家与汪先生交往的片段，而令我感兴趣的还有此书中所附的著作版本、书法、绘画、手稿、签名本以及书信等图片，现今这些东西都成为了十分珍贵的艺术品和研究资料。关于汪曾祺，舍下藏有他的全集，但还是购藏了山东画报所编选的一套文集，其所包含的《人间草木：汪曾祺谈草木虫鱼 41篇》、《汪曾祺说戏》、《汪曾祺说师友》、《汪曾祺文与画》、《五味：汪曾祺谈吃散文 32篇》等，此文集分别遴选汪曾祺的各类散文作

品，读后倍感一个如此精湛的文学家背后，还交织着自然爱好者、戏曲家、书法家、美术家、美食家、鉴赏家、收藏家等等多个不同的身份，这很让我想起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的一个绝妙评价：“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7月22日,长江流域将可以观察到500年一遇的日全食,随着媒体的不断加温,日全食已经演变成一次全民的集体行动。

对于一般人而言,日全食不过是一次观测体验,并无太多值得深究的地方,不过假如我们回溯《中国天文学史》(陈遵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周代已有观察流星、彗星以及日食的专门官职一保章,当然天文学还与历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像日全食的预报则是作为历法检验的重要标准。不过于我而言,科学意义上的天文现象并非最为重要,我所关心的问题则是与天文现象相关的政治观念。

天文现象与政治最为直接的联系,可从周代以降的占星术论起,直到汉代的“灾异说”,开辟了上千年绵延不绝的政治神秘主义思潮。这种思潮一般认为,自然现象的灾异或祥瑞是世间人为活动的征兆,这种理论的建构上至如《尚书·洪范》这样的著述,到汉代董仲舒则为集大成。有趣的是,《春秋》里记载最多的灾异就是日食现象,后世以灾异说作为基础,来对这些日食记载一一地赋予其意义,于是就完成了一个从“天”到“地”的意义转换,政治神秘主义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形成。

现代人大抵会反对这种政治神秘主义思潮,毕竟启蒙时代以后,人们对自然现象已经有了一个“客观”角度,但是奇怪的是,每到自然灾害来临,“天谴论”之类便会甚嚣尘上,这又究竟为何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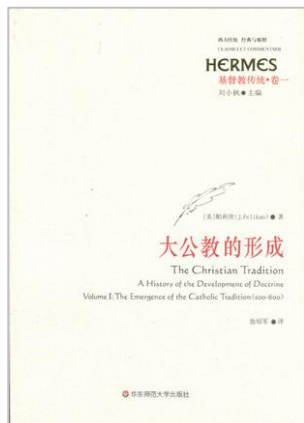
其实政治神秘主义的根源,或许是宇宙神秘主义与个人心灵神秘主义在现实社会的投射,天文现象由于遥不可及,很难以实证的方式去操作实验,更难以理解,这才会让天文本身就带有一种“难以穷尽”的神秘主义特质。只要这种神秘主义无法消除,政治社会领域的各种“灾异说”就无法消除,每当人类所无法操控的天文异象出现,便会有各种政治隐喻悄然而至,几乎已成定律。

除开日全食这个焦点,本月可推荐的好书并不多见,当然有我个人非常感兴趣的帕利坎(J. Pelikan)的《大公教的形成》(翁绍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就属于重点推荐之列,著者帕利坎的这套基督教传统丛书五卷本是英美神学研究的经典,不过我个人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这并不是一套所谓的“客观史学”,而是以教义为主导,这就使得我们可以从其著作中了解到教会作为一个延续上千年的组织体制,其内部的思想是如何绵延发展的。

不过通过刘小枫的序言才知道,这个中译本来之不易,并且后四卷的翻译更是遥不可期,我本打算在美国购下这套英文本,后因价格实在不菲而放弃,如今看来,中译本的“善始善终”可能将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了。

另外一本推荐阅读但不推荐购买的则是季羨林的《真话能走多远》(新星出版社,2008年5月),季先生驾鹤西归,学界悲恸,公众关切,一位以治古印度语言为业的专业学者,身前后居然拥有如此大的公众影响度,本来就让人感觉好奇。季先生的著述我大抵只读过《牛棚杂记》,其专业方面的研究自然非我等所能探究一二。不过之所以还在这里提到《真话能走多远》,主要是因为季先生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和巴金一样,以对文革说“真话”而闻名,不过“真话”其实并非“真理”,读完全书,大抵感受到的不过些许常识,或许有人会说,虽是常识,却是得之不易,我自然同意这样的道理,不过以浩劫之后的真话而能享誉天下,未免觉得似乎有点“得来全不费功夫”,当然,真正的“功夫”或许是背后那只隐形的手所完成的。

最后要提到的是一本关于文化批判的著作,雅克·巴尔赞的《我们应有的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巴尔赞之大名,在文化史领域是路人皆知,他的《从黎明到衰



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 10 月）更是曾经受到过余英时先生的大力推荐，不过这套书的翻译遭人诟病甚多，读者不可不察。这本《我们应有的文化》最让我感到兴趣的，是他对批评家、文化市场等一系列的文化生产中的重要角色进行点评，以揭示今日文化的危机所在，中国的文化事业自然一直处于危机之中，巴尔赞所针对的文化危机或许对于我们而言，只不过是一些危机过后的“阿司匹林”，止痛而已，未必能正本清源，假使读者了解这层意味，不妨一读。

7 月是炎热的，空调只能加剧我们对“人造物”的依赖，为了缓解整日享受空调所带来的不适，我总习惯在深夜关上空调，在清风吹拂下入眠，不过此刻的我，汗流浹背，已难抵御“夜半的高温”，虽有心多推介两本新书，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在此打住，也希望各位少开空调，多多环保。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微博客 Twitter 在摩尔多瓦议会选举中小试牛刀，随后又在伊朗总统大选中大展身手，一时技惊四座。饭否是 Twitter 的中国山寨版，7 月初，赶在饭否临终之前，我体验了它的威力。140 个字的容量，相当于两条短消息，但就是这么一个二加一的技术，将手机和网络融为一体，街谈巷议以电子的方式复活。你添加多少关注对象，就拥有多少只耳朵；你被多少饭友关注，就拥有多少张嘴巴。不过，有街谈巷议，就有飞短流长，就有道路以目。BBS 是茶馆，博客是客厅，微博客更像广场。你在广场上可以自言自语，但是这不会改变广场的公共空间属性。我们一提到广场，就联想起街头运动，但街头运动只是广场的非常状态。一个国家，如果广场几乎没有街头运动，那肯定是病入膏肓；如果天天上演街头运动，那肯定也是气血不和。在更多的时候，广场是公民进行对话演练的场所，这样才能在不动声色之间活血化瘀。

遗憾的是，我们的意见领袖们至今还没有学会对话。我不太喜欢“领袖”这个词，顺便也不太喜欢“意见领袖”，鉴于这已是传播学的一个经典术语，暂且入乡随俗。这几年时评兴起，时评家们水涨船高，很有一些以意见领袖自居。我在书店里看到一本《网站首页：“意见领袖”是怎样炼成的》（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 年 6 月），作者署名盛大林，简介称他“近两年，基本上每天都要发表一篇新闻评论，其中绝大部分被四大门户网站的博主主页推荐，基本上每周都有文章登上四大门户网站的首页”。我赶快回去补课，认真学习这位时评家的事迹，发现他还曾出版《毛主席诗词钢笔字帖》（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1 年），终于明白所谓意见领袖，就是指“意见”加“领袖”，一边弘扬公民精神，一边保持领袖情结。

这种意见领袖不是少数，在饭否上，有好几位不知因为什么，捉对儿厮杀，杀得天昏地暗。胡泳先生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网络意见领袖？》（载《南方都市报》2009 年 7 月 1 日）里重申了捷克公民哈维尔在整整 20 年前提出的八项对话基本原则：对话的目的是寻求真理，不是为了斗争；不做人身攻击；保持主题；辩论时要用证据；不要坚持错误不改；要分清对话与只准自己讲话的区别；对话要有记录；尽量理解对方。这种提醒非常必要，一个意见领袖，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公民，否则他有可能成为领袖，却不太可能成为意见领袖。具有一百多年历史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已经形成汉化版的“南塘十三条”，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转述，建议意见领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向安徽阜南塘村的村民们学习一下。

需要检讨的是，我这样冷嘲热讽地批评意见领袖们，同样不够遵守对话规则。关于网络空间的话语规则，胡泳的《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9 月）具有深入研究。对网络的研究，常见的是一些数据统计、功能分析、技术评估，胡泳从思想史和政治学的角度，选取了“公”与“私”这组概念切入，既拓展了网络研究的空间，又尤其符合中国国情。在中国，网络不只是媒介，它已经构成另一重现实，



网络研究也不仅属于传播学，而是属于各个学科的交汇点。

在所有的文字都被拆解为 140 个字一段的微博客时代，需要时时重返典籍，养气自守。最近，王夫之著作得到重印，包括《宋论》（中华书局，1964 年）、《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 年）、《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62 年）、《诗广传》（中华书局，1964 年）等。钱穆先生曾经回忆，在清末民初，凡是开新风气的人，几乎没有人不读《读通鉴论》。现在，由于我们很少接触典籍，便把它们想象成断烂朝报，敬而远之，如果稍作接触，会发现很多著作都像今天的博客，读来非常亲切。只是今天很多博客如同口水，前人的博客更像酿酒。当然，这种今不如昔的感慨，由来已久。以“博客集”《日知录》而著称的顾炎武，将时人著书称作铸钱，将古人著书称作“采铜于山”。有友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回答说：“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不用多说，顾炎武要是在今日大学，一年只写十几则博客，离下岗就不远了。

ART 艺术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连续两年的夏天，都遇上了西班牙语独立佳作。去年是《死亡录像》，今年是《睡眠经销商》。

作为一部科幻类影片，墨西哥裔导演 Alex Rivera 在片中的种种设置与构想既指向了网络时代进化的某种可能，同时也加入了不少异常辛辣的讽刺，宛若墨西哥之辣椒。影片中的世界是一个劳动力，或者人力资源实实在在地变成了人力资本（一如眼下的金融资本），可以通过网络传输到地球任一角落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当中，就算身在墨西哥，却同样可以通过远程网络从事在加利福尼亚摘橘子的工作。

乍看上去，那似乎是一个天下大同的时代。只要与网络链接，人便可以无处不可及。但反讽的地方恰恰在于：那同样是一个限制人口流动的世界，大多数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出生地。出生地附近的大城市已经是所能抵达的最远处。由于远程网络的极度发达，人的流动变得没有必要，而作为运营成本被严格地控制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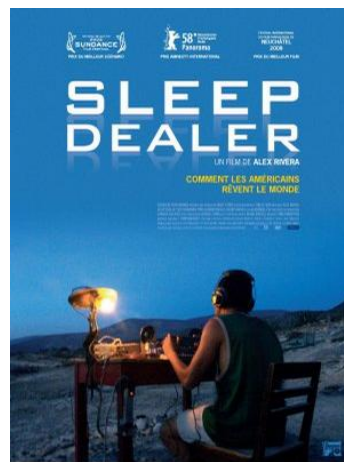
但在观影过程中，最为令人触目惊心的恐怕还是要属极度发达的网络对人所造成的异化程度。为了更好的驾驭远程网络，人们必须在自己的身上安装接口，以便让自身的神经系统与网络完全对接。这样的接口在日本的动漫中早已屡见不鲜，不管是插是拔我都熟视无睹，理所当然。然而，当这一安装过程通过写实的镜头毫发毕现般呈现时，在这个室温 30 度的房间里我不寒而栗，几乎不忍看下去。

片中，女主角在替男主角安装这样的接口前曾这样说到：记住，这是一个双向的通道。有时是你控制机械系统，有时是你被系统控制。尽管眼下的我们与网络之间还没有上述那般的“亲密接触”，但其中的互动模式 and 作用原理却是一脉相承。网络在给我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究竟对我们的阅读，思考，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异化，实在是冷暖自知。

即便是在看完电影之后，我依然无法明了为何片名会叫做《Sleep Dealer》。虽然“Sleep Dealer”正是片中非法工厂的名字，但影片本身却更像是围绕一个名为“Truenode”的记忆售卖系统来展开。从而，我只能暗自揣测：既然记忆可以售卖，那么也许有一天睡眠也可以以某种方式被售卖；又或者，导演其实在说，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某一社会系统之下究竟出卖了自己的什么，是劳动力，还是灵魂，整个人宛若游弋于睡梦之中。

记忆，身体的异化，同样是日本动画大师押井守作品中的主题。在《攻壳机动队 1》当中，“傀儡师”通过篡改他人的记忆来作案。一个以为自己有着美满家庭的垃圾清扫员其实却在一条狗的陪伴下独自生活了十年。当真相呈现，作为个体的清扫员亦随之崩溃。

不论是在当下，或是可以预见的将来，记忆，对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identity）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旦记忆丧失，或者出现了诸多关于自己的记忆，那么作为“个体”的“我”也将消失或分裂。个体，将无法看见一个关于“我”的清晰图景，丧失建立起作为单一主体的“我”的能力。



然而，正如片中所展现的：被篡改的记忆，其实无异于幻觉。那么，一旦记忆可被操控，我们究竟是选择相信“记忆”还是“幻觉”呢？选择相信“记忆”的“我”和选择相信“幻觉”的“我”又是否是同一个“我”，同一个“主体”呢？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引入“集体记忆”，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对集体记忆的篡改以及操控可以是灾难性的。在这样的操控之下，将十分不利于该集体（族群）内多元的，独立的个体的诞生，从长远来看无疑有悖于集体（族群）的生命演化法则。

但押井守似乎并不打算止步于来自记忆的认同危机。借由“义体化”这一现象，押井守把问题推到了某种极致：在当下的社会，一个人就算精神分裂，或者变成植物人，他依然很可能被自己的家庭所认同，认为是家庭的一员。但如果是在“义体化”（指身体大部分，甚至全部用义体改装）的时代，当一个人失去记忆，或者记忆混乱，那么剩下的这副作为义体的身躯应当被视作怎样的“存在”呢？这样的义体，这样的“肉身”，是否还可以被当作一个个体呢？

对于这样的问题，押井守在两部《攻壳机动队》中都不曾给出回答。但在我看来，他的答案却似乎早在 89 年的《机动警察》当中就已给出。答案很简单：那就是不要义体化。只要科技无法达致全身体化的水平，那么我们就没必要面临这样棘手的问题。能够达致全身体化的科技，不正是科技世界中的巴别塔么？

某种程度上，89 年的《机动警察》已经展露出押井守在灵魂以及自我认同问题上思考的起点：机器人是否也可以拥有灵魂（如果他有足够多的记忆，如果他接触到足够多的信息——这一点在攻壳时期加入）？所以，表面上看来片中的机动警察最终力挽狂澜救众人于水火，但对于那位企图造就这一灾难的天才设计师，押井守却可能持赞同的态度。否则，他不会在片中如此大量地引用《旧约·圣经》。



行文及此，忍不住要提及的是押井守 08 年的新作《空中杀手》。这部新作被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过于平淡，甚至冗长；但在我眼中却是恬淡与诗意。我是在后来才看到押井守去年在《空中杀手》的日本首映会上对在场大学生们发出的感慨：

“我制作这部电影的动机只有一个——我已经过了 55 岁了，刚开始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正好 55 岁。我现在才真正开始了解自己的人生。所谓的人生，无论是对小学生来说还是对这些大叔来说，都是很痛苦的。这是很正常的。对于你们这样年龄的人来说，现在只是漫长的马拉松的起点。而我则是跑完一圈的人。我作为一个要开始跑第二圈的人，有些话想要告诉你们这些正在跑的人：很痛苦吧……其实我也很痛苦。但其实这感觉还不坏——当你跑到终点的时候能看到不错的风景。这就是我过了 55 岁之后的感想。”

让我真正好奇的地方则在于，是否每个导演都会十分明确地感知到自己的第二圈？是否在感知到自己人生第二圈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思考人生的含义，而触及轮回？而让我彻底毫无头绪的地方却是在于：为什么在押井守的作品当中常常会出现一只可爱的长耳犬？当然，我深信：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其实是不需要理由的。

也许是此前所抱期望太高，在看《新宿事件》的时候我虽不致像舒琪老师那般有中场离席的冲动，却也在好些地方不住扼腕，心说：这个地方要是让老杜来拍就好了。诚然，比起尔冬升的上一部《门徒》，《新宿事件》要好上许多；但就我个人的观影经验而言，依然更喜欢他的小制作《旺角黑夜》。而要说《新宿事件》足以成为新的黑帮史诗，恐怕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新宿事件》的扬名，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该片在内地的被禁，以及尔冬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抛出的“港片三年内必亡”之论调。我对该片的期望大约也由此而来。但《新宿事件》的演员阵容本身，却暴露了尔冬升在影片拍摄之初所做出的妥协。是的，我是指徐静蕾和范冰冰的参演。内地电影市场对香港电影的开放，其条件之一便是大陆演员的参演。正是在这一条例之下，香港的诸多导演在舍不得放弃香港本土优秀男星的情况下，往往只能把女一号，女二号的位置留给大陆的演员。几年下来，在所谓的港片当中，香港本土的女星几近消失。而那些启用大陆演员的电影看起来也总有种吃夹生饭的感觉（当然，这其中更有主动阉割剧本的因素）。仅此一项，便注定了尔冬升打算将《新宿事件》作为纯正港片来拍摄之先天不足。



回到影片本身，几位主演(除了吴彦祖之外)的表现基本可以用平淡来形容，反是作为外援的高捷与竹中直人其表演十分出彩，抢尽了风头。而在叙事线条和情节的推进上，也有不少突兀之处，尤其是后半段的突然加速，令人徒生草草收场之感。尽管尔冬升此前在移民这一题材上下了近 10 年的功夫，却没能很好地在影片中得以出来，这很难说不是一个导演的驾驭能力的问题。

平心而论，我是极为赞同尔冬升的“香港电影衰亡论”的。在我眼中，大陆市场的有条件开放，其实是对香港电影的一种长期伐害。而颇为讽刺的是：正是在尔冬升的《新宿事件》当中，徐静蕾，范冰冰的表现，以及围绕成龙的部分情节设置恰恰向我们展现了香港电影是如何在这样的伐害之下，一步步走向衰亡。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HONGKONG 香港

香港，成为我的香港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fei.yan@green.oxon.org）

人们常常说香港是个移民城市，荟萃中西文化。我们所熟悉的香港故事，一般也是以香港移民社会的特质作为叙述起点，但却以生于斯长于斯的香港人作为单向度的叙述焦点，而把大部分的新移民放置于香港故事的框架之外。即便是仅有的一些关于新移民的论著，也多是很笼统地关注这些新移民给香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政府的应对之道，而忽略了他们这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似乎但凡谈及新移民，就会想当然的和这样一堆关键词联系起来：综援贫困、家庭暴力、老夫少妻、孕妇来港产子等等。但是事实上，香港的新移民们，他们也是七百万香港人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移民的这一路走来，有过无声的艰辛，也有过“香港，会成为我的香港”的梦想。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又是如何的呢？



从这层考量出发，7 位七十年代在内地出生、童年时随父母移居香港的七字头新移民们聚在一起，在这本书中共同书写自身的移民记忆、在这个城市成长的经验、面临九七而有别于香港人的前途困惑，以及种种由身份而引发的对香港和中国的纠结情感。

身份与认同是这一批七字头新移民所共同面临的最大问题。回首 1970 及 1980 年代，那个时候正是香港经济起飞，股市畅旺的黄金时期。经济向荣，连带着人人都金光灿烂，餐餐都要鱼翅捞饭伴干邑——把昂贵的鱼翅用来捞饭捞面吃，可见当时香港经济的繁荣程度，香港人的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就此到了极点。财气之下，难免于无形间滋生出很多的傲气与优越感，这股子优越感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内地人面前又会得到成倍的放大。1979 年，无线电视连续剧《网中人》在香港热播，一位刚从大陆来到香港的新移民程灿，在电视里笑着说：“我係阿灿呀！”在香港陌生文化与环境，程灿被刻意刻画成一个愚昧、憨厚、封闭、缺乏修养、说话带口音的内地人代表，“阿灿”也因此成为一种贬低内地新移民的歧视性标签，而香港人也在标签内地人的这一

过程中获得了精神上和身份上的双重满足感。

在说普通话成为潮流的今日香港，那些依靠海外文凭和技术在港占得一席之地的新一代“内地新来港定居人士”，是无法想象那个时代的内地移民所遭受到的巨大歧视和不公，而这种歧视的压力又并非仅仅来自于单个个体的嘲讽，而是整个社会的偏狭与排斥在日日逼迫着他们本已狭小的生存空间。从几位作者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们的父母辈，无论之前是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拥有一技之长的工程师，来到香港后由于内地的学历文凭不获承认，又不会说粤语和英文，即便已经人过中年，但是为了生存，只能在车间或者工地上从事一份低级简单的重苦力活。而整个家庭由于新移民的身份，又没有权利享用住公屋的福利。廉价的公屋，是香港政府四大福利建设中的一项，但是只有在香港住满七年的合资格香港人才有资格申请，这就使得绝大部分的新移民只能全家寄居在亲友处，或者蜗居在狭小的工棚里。艰苦贫穷的生活更加将这些新移

民与香港社会隔阂起来，几位作者在香港寄读学校里，因为害怕被别的小朋友嘲笑自己是“大陆妹”，均很少主动交朋友和参加学校活动，甚至很少主动说话，这种疏离之下所带来的自我价值贬抑，那感觉就如同“发现自身犹如一张过期奖券，连带着往日从长辈、亲友邻里的真实怜爱中折射出的自我价值，也一并作废”（梁以文）。

前途与命运也是这一批七字头新移民时时忧于心间的苦恼。在那个你斗我我斗你的动乱年代，由于家庭出身的不好，七位作者的父母辈们不得不无奈地选择远离家乡，来到陌生的香港。与其说是移民，不如说是躲避政治迫害与纷扰。在香港的生活虽然一贫如洗，又时常遭受身份上的煎熬，但好歹这里可以自由地凭借着双手去开创一片生存的空间，而不必再经历那种是非颠倒，鬼蜮横行的黑暗现实。所以很自然的，这个时代的新移民们都对未来与前途充满了无限的渴望。可是谁想到，甫一进入 80 年代，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开始了。1984 年，中英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回归进入倒计时，遥远的“九七”一下成为时间点上的大限，有能力的香港人纷纷移民海外，而这些刚刚在香港奋斗出一点名堂，已经取得或者即将取得香港正式身份，并欢天喜地的准备购买他们第一套住房以在香港安定下来的新移民们，前路又何在？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似乎一下又要倒退回过去的苦难之中，这份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一——无论怎么逃避，都挣脱不了那个命运之网（这里必须得指出的是，这一批新移民在前途问题面前，内心里其实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政治恐惧，另一方面则是对于故乡难以磨灭的情感。两者交织在一起，回归祖国，竟变得如此的忐忑不安）。在书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作者们所不约而同记录下的叹息与沉重，在这一段时期内长久地弥漫在每一位新移民的心中。

然而，尽管有着这许多的不堪与彷徨，7 位作者，以及更广大的这一批 70 年代内地新移民们，并没有就此向命运低头，而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自力更生，拼搏出一个又一个我们所熟知的“香港故事”。这段历程在他们的生命中，或许只是一段细碎的、原以为不复记忆的往事，但对于香港而言，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和精神形态，却因为这些七字头新移民们的这段生命历程，而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香港，也是他们的香港。

梁以文等著：《也是香港人：七字头的新移民志》，进一步多媒体有限公司，2009 年 4 月。

ENGLAND 英格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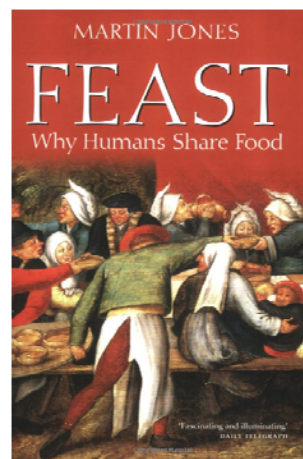
吃得民主，吃得自由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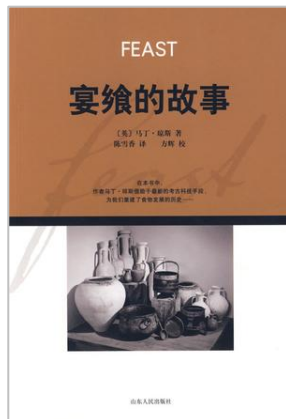
回广州数日，饭局接二连三，虽然嘴一刻也没闲着，却很少有一顿吃饱过。在如今主要由烟、八卦和器皿的碰触声构成的饭局里，“吃什么”的本体论已经让位给“按什么顺序吃”的方法论。比如，动箸得领导先动，敬酒得按长幼之序等等。但其实这种饭局文化，不特为我中国所有，类似的记述，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希腊便已存在。

《奥德赛》第三卷记载忒勒马科斯来到奈琉斯城打听父亲下落，刚好遇到国王奈斯托尔举办祭祀海神波塞冬的宴会。忒勒马科斯希望在宴会中通过国王之口探知父亲下落，却又不知如何启齿。雅典娜给他出主意说，不妨从进献食物入手。忒勒马科斯依计行事，祭食之时先献海神与国王，随后是两位王子，最后才是臣民。奈斯托尔觉得这年轻人很懂事，遂将他知道的消息告知忒勒马科斯。

这场远古希腊的“饭局”，对于今后一切饭局的影响，真是源远流长。20 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都在力图用实地考察来恢复这次虚构晚宴的真实面貌。1952 年，一位叫米歇尔·凡提斯的建筑师率考古队在希腊南部的山区中发现了古代普洛士宫殿的遗址，并从中发掘出数量可观的宴会用杯。众所周知，古希腊人喜欢以社交的方式传饮酒杯，但有趣的是，金制或银制的圣餐杯往往只在王座室里传递，质量稍粗糙的细粘土酒杯则在王座与庭院的交界处被传递。最次一级的粗土酒杯，只能在宫殿外的庭院被传递。



这种食物传递模式,属于典型的希腊式“分级的民主”,说白了就是一种资源分配的等级制。剑桥大学考古系教授马丁·琼斯认为,一个社会如何分配食物直接反映着该文明的结构。在《宴飧的故事》(*Feast: Why Humans Share Food*)一书中,马丁教授仔细考察了自古代迈锡尼文明到今天麦当劳文明的宴会习俗,得出如下结论:面包本身并非一种文化,如何分配面包才是一种文化。我们的整个历史就在这对面包的讨论中获得记忆和被反复确认。



就以面包为例吧,早在公元前 79 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淹没的庞贝古城中,考古学家就发掘出了保存最早的面包。当时的面包被设计为椭圆形,适于多人切割共食。千万不要小看面包这种食物,它的出现,不仅体现着农业种植技术的发展,还预示一种集体围成圆形的、更加“统一”的就餐方式,英语的“团体”(Company)一词便是出自拉丁文“与面包在一起”(Cum Panis)。地中海的旅行者们把面包视为同伴,将之散布到世界各地。建立在共同食物基础之上的基督教,更是将面包和犁作为布道的工具,在中世纪来了一次对整个世界的“谷物化”进程。普通小麦之所以成为现代食物链中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马丁教授解释说,正是因为面包的作用。

不过,现代社会人们的进食方式似乎已经彻底背离了传统饮食形式。史万生、麦当劳的出现让人们的饮食越来越商业化、非集体化。当面包不再被分食而成为一种只在个人隐私空间出现的食物时,它仍然是一块文化意义上的面包吗?

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虽然除去各类饭局以外,人们的进食方式越来越个人化,但古代人围坐在一块吃饭的那堆“营火”其实并没熄灭,只是换了种方式燃烧。根据马丁教授的考察,自欧洲 18 世纪资本主义勃兴以来,资产阶级们越来越将进食视作私人行为而不是公共事件。巴黎街头的咖啡馆、家庭的独立餐厅的出现实际上是要让人们从以前束缚性的“营火”中解脱出来,以一种更自由的方式选择和谁吃饭、以什么方式吃饭。早在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之前几百年,人类已经有了“吃”的自由,它是民主概念自然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公民社会的起因。

写至此,猛然想起晚上还有饭局。趁自己的胃暂时还属于自己,我准备在下午溜进一间不为人知的咖啡馆,就像村上春树说的那样,一边听罗西尼的歌剧《贼喜鹊》,一边如一位现代社会的公民那样独自享用一盘美味的意大利面条。

Martin Jones: *Feast: Why Humans Share Food* (paperbac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y 2008.

[英]马丁·琼斯著:《宴飧的故事》,陈雪香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年 3 月。

BOOKREVIEW 书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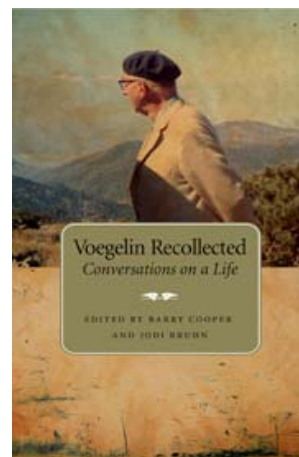
沃格林:探究灵魂的哲学家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在当今的政治哲学领域里,学界通常会把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看作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关于这两位的研究著作及论文在学院的生产体制下,如今已呈汗牛充栋之势。不过当有一位学者突然告诉你,当代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并不是“罗哈”二位,反而是两位学界的边缘人,您又会有何反应?

这位学者(James Rhodes)口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乃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与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前者对于国内学界而言,经过数年的译介努力,已为思想界熟知,甚至还影响到一批学人按照他的问题意识来观察中国思想。尽管斯特劳斯对中国思想未置一词,甚至他对非西方文明也从未有过些许关注,从这个角度来定位,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者”。

对于沃格林而言,他不仅学过中文,还能做一些简单的中文古籍阅读,在他的《自传回忆录》里,他甚至颇为自得的说,他能在江青的样板戏中找到周代思想的语言遗迹,尽管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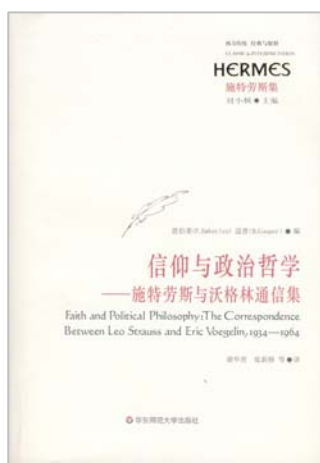


中文的掌握无疑是初步的，但是他却对各种文明的发生与演变有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他不是犹太人，却专门拜犹太拉比为师，学习古希伯来语，甚至对旧约的研究引用，连圣经专家都觉得解读到位。他在十几岁时，已经开始阅读《奥义书》，当中的超越观念，深深地影响到他后来的哲学探索。

如此可见，斯特劳斯与沃格林两人的研究趣味与领域有着极为明显的差距，但是某些相似的问题意识却又将他们两人拉回到同一个研究领域里，什么是政治哲学？好的政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对于如此重要的问题，这两位看法却是泾渭分明，学界中早就流传着他们联手封杀卡尔·波普尔来美国执教的故事，在他们的通信中，沃格林甚至使用了“厚颜无耻”、“一知半解”的“恶言”，而斯特劳斯的用词虽然谨慎许多，但像“简直不值得鄙视”这样的语言也足可显示他们对于波普尔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是何等同仇敌忾。

尽管他们拥有一些表面上相同的立场，他们思想上的分歧显然更为巨大，这种差异不仅使得他们在 1964 年之后就再无通信联系，而且沃格林的学生桑多兹（Ellis Sandoz）后来也颇为讳莫如深地回忆到，斯特劳斯曾经写信给霍普金斯大学“诋毁”沃格林，让其失去获得美国名校教职的机会。显然，沃格林自己深知在二人之间关系上的微妙，却仍然推荐自己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学生去芝加哥跟随斯特劳斯攻读博士，比起后来的斯特劳斯门人对沃格林除了极尽攻击之能事，要么就采取全然不理的态度相比，也可看出，其实学界的门户偏见之深，对于“口口声声害怕被迫害的政治哲学家”而言，也并不鲜见。

有趣的是，我曾注意到，不止一位作者来这样描述沃格林与斯特劳斯的学术通信，认为沃格林像一位“咄咄逼人的学生”，而斯特劳斯更像是一位“耐着性子的老师”，以此暗示二人思想的高下之分。不过在辩论中谁能占据言辞的上风，并不足以让我们确定到底谁更为接近真理，相反，与沃格林有过接触的朋友与学生都回忆道，沃格林的性格率真执着，甚至可用“赤子之心”来形容，他总是期待遇到同道，能够开诚布公地讨论哲学问题，这对于强调“隐微写作”的斯特劳斯而言，这种坦诚显然让他感到不适，这种对于“真理”的炙热之情或许对于斯氏而言，已经违背了他心目中的哲学家形象：审慎多疑，甚至为了防范“群氓”对哲学家的侵害，不惜以“高贵的谎言”隐藏“真理”。这两种态度已经牵涉到他们二人对哲学看法的基本分歧，这里难以详述，但是他们二人气质上的迥异，已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或许有读者会好奇，既然将沃格林与斯特劳斯看作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假如只在他们二人之间作观点的比较，显然无法让人信服。而这或许要去追溯沃格林的思想学术成长史，才能了解他与其成长的时代存在何种内在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如常人一样，误解他们是一帮顽固不化的“保守主义者”，总是异想天开回到“古代”，恰恰相反，沃格林并不是简单地追慕先贤，而是在其成长经历中，看到“意识形态”的群众运动带来的政治无序，尤其以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代表，从而开始对当代最为深重的政治思想病灶进行诊断。

沃格林 1901 年出生在德国的科隆，1910 年跟随父母移居维也纳，后来进入维也纳大学，他选修政治学也只是因为经济方面的考量，因为这可以让他提前毕业。不过幸运的是，他获得了洛克菲勒奖学金，得以游学美国，也得以担任当时维也纳最著名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凯尔森的助手。当时的他追随着凯尔森的新康德主义传统，但是在游学美国之后，尤其是 1929 年在海德堡大学遇到雅斯贝尔斯之后，他的哲学道路开始发生偏移，雅斯贝尔斯给他打开了阅读克尔凯郭尔的大门，当然还有海德格尔、胡塞尔以及柏格森。对于雅斯贝尔斯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他晚年回忆道：“对我而言，学院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的，它们要求成为一种科学，那只不过是一个关于各种事情的讨论而已，讨论的内容根本不是关于我们存在的基本问题。就我的自身意识而言，我并非天生的哲学家。但是当性世界没有了哲学，让哲学出现，让人们注意到伟大的哲学家，尽力去阻止混乱，在我们的年轻人中间激发出对真正哲学的兴趣，则成为了我的使命。”

不过纳粹运动的崛起让他开始思考政治秩序的正义问题，他写下了《种族与国家》、《从 Ray 到 Carus：种族观念的思想史》等直接批判种族主义的文章，从而也让他奥地利被德国合并之后，遭到盖世太保的追捕，最终仓皇逃离维也纳。据沃格林的夫人回忆，长久以来，无数人都认为沃格林是一位犹太人，或者是一位天主教徒，因为除了这两种身份，实在找不到任何理由逃离维也纳，甚至瑞士的美国外交官因此怀疑沃格林的真实身份，拒绝给他颁发签证。

在美国的几所大学进行短暂的停留后，沃格林离开欧洲难民积聚的东部，来到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担

任政治科学系的教授。偏安南部一隅，自然无法与美国东部名校相提并论，但正是在这个偏僻之地，他撒下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种子。他当年在 LSU 的学生曾回忆，当年沃格林来到此地，完全让他们眼前一亮，尽管他的课程以要求苛刻而闻名，但是学生们仍然把听沃格林上课看作是一次智性上的挑战。不过他在这里却知音寥寥，在美国主流学术传统里，实证主义根深蒂固，一位沃格林昔日的同事还笑称，当时的同事中许多是“反沃格林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操着德国口音的政治学教授到底在讲些什么。

在 LSU 的这 10 余年里，他完成了了思想上的大转变，他本意是想以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作为蓝本，写一本关于政治思想史的教科书。但没想到的是，一旦当他开始写作，却再也无法结束这本书稿。他开始意识到，传统对于政治哲学的理解是错误的，是一种对于“真实”的偏离，因为政治观念一旦被概念化，就与人的体验渐行渐远，最终政治思想成为一套自我封闭的理论话语，而政治思想与个人心灵体验带来的社会后果从此被切断了。在 LSU，他出版了《新政治科学》与《秩序与历史》的前三卷，开始确立了他自己的研究风格。而正是在这段时间，他昔日的导师凯尔森，来信批评他的《新政治科学》，不过沃格林夫人回忆说，他收到了凯尔森的手稿，当两人读完后，沃格林问夫人作何感想，后者幽默的回答道，“我喜欢看到满篇文章都写着沃格林的名字！”

1958 年，他接受了慕尼黑大学的邀约，接替的讲席乃是当年韦伯的位置，而他从头开始，创立了政治科学研究所，用他后来的话说，他之所以要回到德国，是想以一己之力，消除德国政治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病毒。但是他在慕尼黑的学生与朋友也发现，尽管沃格林培养了一个小规模的学生圈子，但是他的性格直率专断，不善权谋，最终得罪了校方以及同事，1969 年，他黯然离去，回到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大本营——胡佛研究所，不过沃格林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当然，他很享受这种被误解的“资助”。

好奇者或许会问，沃格林的思想到底拥有何等特色，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述说他的经历。毕竟他的学术履历在常人看来，并不算显赫辉煌，甚至可以说他只不过是边缘角色，他终其一身，也没有创立过所谓的“沃格林学派”，也没有在美国的名校里培养出一帮门生为其鼓吹。他并不算一位优秀的老师，因为他永远在寻找政治科学探索的同道，这也使得他对于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或者缺乏哲学兴趣的学生，经常是粗暴武断的，尤其是当他离开自己的小圈子，他更是高度警惕，仿佛时刻要与“心灵失序”的人进行战斗，这也使得他经常显得极端傲慢。有位曾亲炙过沃格林的学者告诉我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在沃格林的讲座提问时，当一位在美国政治学界权倾一时的教授提完问题后，沃格林竟然不屑给予回答，直接说，“下一个”。

这种傲慢自然让他得罪了无数同行，但是他的这种无礼或许也反映出，他终其一身无时无刻都在反对现代的主流思想，比如实证主义，比如马克思主义。这直接来自于他的一个基本看法，那就是现代哲学以一种封闭性的概念思考作为出发点，从而最终失去了对超越与善的经验追寻动力，一旦当哲学不再以“真理”与“善”作为主要目标，哲学也就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死亡的理论。在他眼里，甚至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样的思想家，都成为了这股潮流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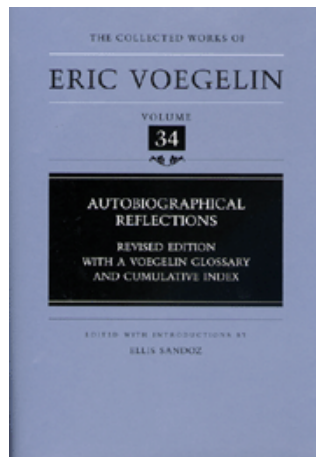
关于沃格林的思想，那恐怕需要大量的篇幅才能予以说明，但是他后来所作的历史哲学研究，正是在这个新的哲学基础上展开的，他探索各个古老文明在对超越真理进行表述的不同符号上，比如先秦的“天”、犹太教的“拯救”等等。对于沃格林而言，哲学就是一场对于真理的探索，而这个真理是不能用实证主义来进行限定的，而是要考虑到人作为一个精神性的存在，是如何被一种神秘的超越力量引导，不断地提升自我的意识高度，去寻觅那纯粹的善与世界的圆满，尽管他同时也强调，人其实永远无法抵达至圆满之境，永远处在一种“神兽之间”的状态，但是人的这种求索与挣扎，却是哲学的根本动力。

当沃格林还在 LSU 时，哲学系一位自视甚高的哲学教授曾经当面质问沃格林，“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一位哲学教授。”而沃格林回答道，“或许吧，不过我是一位哲学家。”

Voegelin Recollected: Conversations on a life, Edited by Barry Cooper and Jodi Bruhn, 2008,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Eric Voegelin: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llis Sandoz, 1989,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恩伯莱、寇普编：《信仰与政治哲学：斯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6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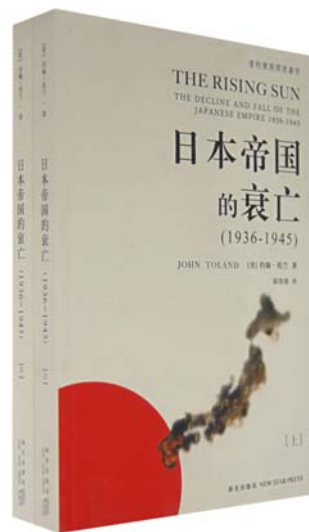
BOOKREVIEW 书评

隐现的问题

——重读《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

特约撰稿人 孙传钊（上海，sunchuanzhao@yahoo.com.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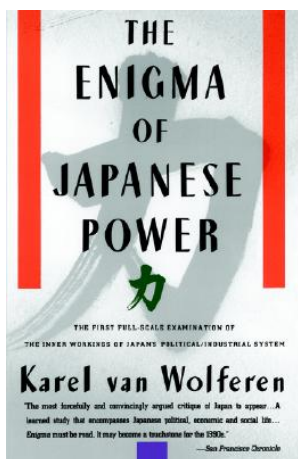
最近几年，据说日本各种书籍的中译本在国内销路不错，所以，今年春天不少日本小说中文版相继问世，形成一个热点。顺着这个出版潮流，前不久，约翰·托兰的《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John Toland, *The Rising Su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36-1945*)，在三辉图书出版公司策划下，以取得翻译版权后的新的中文版面孔，27年后再度在我国书店里出现（它1982年由新华出版社初版），依然赢得不少读者。这反映出四分之一世纪后的我国的日本研究没有长足进步。如果日本研究有很大进步的话，该书早应为更多读书人熟识，早就重印或再版。而且如果日本研究有很大进步，我们的出版界也会推出更多的我国学者、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相关论题的名著。《日本帝国的衰亡》主要叙述的是美、日之间的战争史，只有少数谈到美、日两国为在中国利益冲突如何日益加剧时，从背景叙述到日中关系和抗日战争概貌。尽管如此，中国读者还是可以从这种“大历史”的叙述中，读到不少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未曾提及的细节。除此之外，虽然托兰是个史学家，该书“许多材料系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也有不少史料使一些原为日本天皇的公卿贵族、重要的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提供的”，所以叙述的诸事件有相当真实性，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原由也在于此。而且，托兰关于二战纪实著作，都是以优美笔调，参杂历史人物的对话细节描写，娓娓讲述故事的手法，具有一般历史学学术著述不同的文学性、可读性，也是吸引读者，成为被各国读者欢迎的畅销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托兰也是其著作最多被翻译成中文的同类欧美作家之一。我们还可以读到他的《从乞丐到元首》、《漫长的战斗》、《占领日本》等书。



无论托兰如何精湛地叙述，其价值观还是在他的著述中不加掩饰明显地流露出来。这种历史观，在这次新版问世后，很快遭到中国读者的质疑。有一篇网络书评的作者如是责问：

此书的作者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来看待那场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惨痛灾难的非正义侵略战争的，按作者的理解：似乎日本要发动那场战争，日本天皇、日本首相、政府官员、高层军官完全没有责任，或不承担主要责任，他们在内心都是不愿意发动战争的，他们的战争决策行为是不得以的，是一小部分的狂热低层青年军官策划了那场战争，是狂热低层青年军官们出于爱国热情和受到个别人的挑唆，而强迫日本天皇、首相、政府官员、军部高层军官实施了那场战争，这场战争是本可避免的一场误会而已，是历史的偶然？战争后来的发展似乎又变成了一场什么解放亚洲人民，反抗欧美殖民主义的、建立亚洲新秩序的“正义”之战了？我不禁要问：难道欧美实施了殖民主义，日本就一定要实施殖民主义？是不是说看见他人在杀人掠夺和作奸犯科，你也应当效仿，还美其名曰你把受害者从前一个施暴者手中解放出来了？你如真是解放那些苦难的受害者，就不应该对受害者们施加比前一个施暴者更加残暴的迫害！（<http://lz.book.sohu.com/serialize-id-9925.html>）

责问是严厉的。但不知道这一书评作者知道不知道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也是众多日本二战史研究者一直关心和讨论的问题。托兰在书中只在其叙述中隐蔽显了问题，没有具体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书的第一部分总标题是“战争的根源”，第一章是标题是：“‘下克上’”。和一些西方、日本学者一样，托兰也把战争根源归咎于1930年代日本社会“下克上”政治体制。且不论当时日本社会下层社会民众是否真有政治权利、下层政治权力是否能够“克上”到左右国家政局和战争进程，但是，笔者以为有三点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即其一，当时各个统治集团不同势力围绕日本国家权力、外交和战



争策略是有激烈内斗的，并非铁板一块，或某人可以简单一锤定音说了算的，即使天皇也不例外。这也导致日本战后追究战争责任时的困难。这种特殊形态体制，尽管战后经历了美军占领下的民主改革，今天依然留下其日本特色的、负面的特征。荷兰学者沃尔弗伦(Karel van Wolferen)在《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1989)一书中指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中不存在一个负起政治责任的中央政府，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日本不是一个“国家”。日本的权力体系不仅包括中央政府的官僚（职业高级公务员）机构、政治机构，还包罗了农协、警察、媒体，甚至暴力团等各种组织、团体和机构。表面看来，这些组织各司其职，再加上各个政党及其政治家和议会的影响力，似乎权力体系是多元的，可是这些机构、组织，哪个也不对国民负起政治责任。与战前相比，因为民主体制，没有当年军阀集团，当今是官僚群体（高级公务员）的权力最大，因为他们掌握和实施着行政权力。理论上说来，官僚在国会议员的控制下，其实并非如此。限制官僚权力的依然是其他部门的官僚。因为为了利益他们之间也产生矛盾和斗争，但是，这也只是局部的，整体上官僚的权力

没有人监督，他们自己又不会自觉限制自己的权力，只有极少数议员、政治家在特定场合会干预、调整官僚之间的矛盾，可是依附官僚集团的是多数。就需要知识分子的监督。这样的国家体制不能容忍追求自由、具有政治责任感的市民存在，“通过企业和媒体来阻碍、压制具有政治责任感市民的发展”，因此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日本国民是不幸福的国民。其二，貌似代表社会底层利益的民粹主义，以正义和进步为幌子，也会因与右翼极端民族主义合流走向反面，是极其危险的思潮。在“下克上”献身的青年军官大都出身于东北地方贫苦农民家庭，他们反对官僚腐败、同情在现代资本主义压榨下的日益贫困的农民，主张社会改革，乃至受民族主义煽动，以为与美英争夺在亚洲生存空间，是把亚洲人民从英美殖民鬼畜统治下解放出来正义战争。其三，托兰也谈到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都有人提出“不扩大”、“不开战”，企图战争“刹车”，但是，最后，这样的反对派总是妥协，于是，整个国家一次又一次陷入更深的战争泥坑中，那是为什么呢？日本学者大杉一雄的《日中十五年战争史：为何战争长期化？》(中公新书, 1996)就是专门围绕这个论题做出努力的著作。他不仅对各个历史政治人物在历史关键事件上所负责任做具体分析和评价，还作了一个归结：海外扩张，无论对哪个群体、阶层都有利益所在——回答了自己提出的“为何战争长期化？”

[美]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1936-1945）》，郭伟强译，新星出版社，2008年4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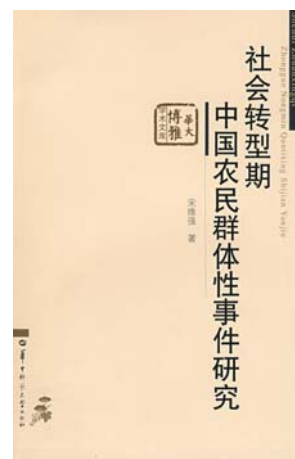
BOOKREVIEW 书评

农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过程论视角

特约撰稿人 刘伟伟（上海，tclww@163.com）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群体性事件进入高发期。据统计，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从1994年的约1万件增加到2003年的近6万件，参与人数从73万人增加到307万人，参与人数在100人以上的由1400件增加到7000多件。其中，农民群体性事件占相当大的比重。群体性事件的高发引起了学术界的“群体性事件研究热”。赵鼎新、李连江、于建嵘、应星等，是这一领域内一再被提及的华人学者。不少政治学、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也都在这一领域选题。《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是宋维强的博士论文。该书采用政治过程论的视角，以社会转型时期的农民群体性事件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利用翔实的数据和实地调研的案例，对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过程、影响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提出了政府应对的政策建议。

宋维强把群体性事件定义为：“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有一定数量群众参与，有一定组织和目的，采取集体上访、游行示威、静坐请愿、非法集会、阻塞交通、围堵党政机关、聚众闹事等行为，对政府管理造成一定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秩序的事件。”这一定义有



待商榷之处在于：把民主国家中已经制度化的“游行示威”、“静坐请愿”与“非法集会”、“聚众闹事”相提并论。对于参加了党代会、人大和政协的绝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上访是最重要的“体制内政治参与”方式。集体上访是农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形式，但上访本身却是个悖论：其一，上访是一种非法治的申诉和救济方式。信访部门不是司法机关，不能直接监督行政或司法部门，而只能将民众的来信转给所涉地区的政府部门，因此不但不能保证民众上访中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甚至可能因转信给地方政府而导致上访者遭到压制和打击报复。其二，尽管上访行为本身是信任政府的表现，但这种信任却首先通过对上访代表或上访组织的信任来表达的。政府则往往认为，上访代表和上访组织与自己“争夺群众基础”、“挑战政府权威”，许多官员们甚至把集体上访视为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操纵和利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各级政府对集体上访活动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采取压制乃至打击措施。根据于建嵘（2003）的调查，湖南省H县曾经以“整顿社会治安”等名义，对“‘减负’上访代表”采取“集体办学习班”、“挂牌亮相”、“罚款”、“抄家”、“关押”等措施加以打击。胡荣（2007）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农民上访走过的政府层级越高，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低。到过省级政府和北京的上访者，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信任度也明显降低。上访的悖论直接导致了政治信任的流失。

1970年，格尔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反》一书中提出了“相对剥夺感”概念。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期望，而社会则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的价值能力小于个人的价值期望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越大，人们造反的可能性就越大，造反行为的破坏性也越强。如果一个社会中人们的价值预期没有变化，但社会提供某种资源的价值能力降低了，就会产生递减型相对剥夺感。如果社会能提供的价值能力未变，但人们的价值期望变强了，就会产生欲望型相对剥夺感。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能力和人们的价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会的价值能力由于某种原因有所跌落，从而导致价值期望和价值能力之间的落差扩大时，就会产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发展型相对剥夺感常见于变革社会。宋维强使用了“相对剥夺感”概念分析了农民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宋维强指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状况都在改善，但是，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在经济、政治和心理上的生存状态，均存在相对剥夺感，因此寻求通过集体上访乃至更激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经济、政治诉求。2008年的瓮安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人与女学生家人素不相识，骚乱的发生集中反映了基层民众对于社会不公正、政治不清明的强烈不满。

1970年代，资源动员理论的创始人麦卡锡和左尔德指出，社会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增多，并不是社会矛盾加大了或者是社会上人们所具有的相对剥夺感或怨恨感增加了，而是社会上可供社会运动参与者利用的资源大大增加了。这些资源包括时间、捐款、媒体等。宋维强指出，农民集体行动的主要社会资源包括社会精英、非政府组织和大众传媒三个方面。以笔者调研过的福建屏南千人环保诉讼为例，非政府组织和大众媒体推动了诉讼的发生和发展。2005年11月1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被告屏南县榕屏化工厂在一年内清理处置含铬废渣，并赔偿原告屏南县1721位污染受害村民68万元。此案被评为“2005中国十大影响力诉讼之一”，被认为是“对立法、司法有重大影响而又为社会广泛关注，可以用来观察法治的案件。”胜诉的关键，既与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的法律援助有关，更与《方圆》（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新闻调查》、《南方周末》、《财经》、《朝日新闻》、《华尔街日报》等诸多著名媒体的不断报道有关。现在，在绿色和平、自然之友和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的帮助下，诉讼发起人张长建成立了“屏南绿色之家”，成为专职的环保维权人士。

1973年，艾辛杰发表了一篇比较美国40多个城市的抗议活动的论文，他发现，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的发生频度与城市中民众对当地政体的影响力之间有一个曲线型关系：当一些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很大或者很小时，抗议活动在这些城市发生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当一个城市的民众对当地政府的影响力处于一个中等状态时，抗议活动发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泰罗（1988）将“政治机会结构”定义为“那些比较常规的、相对稳定的、能改变人们社会运动参与度的政治环境”。泰罗进一步提出了导致政治机会结构变化的四个基本的结构要素：其一，原来被政体排除在外的社会群体，由于某种原因对政体的影响力增大，这就为这一群体中的某些人发起社会运动创造了机会。其二，旧的政治平衡被打破。其三，政治精英的分裂。其四，社会上有势力的团体成了一个社会运动群体的同盟。宋维强指出，随着政治机会结构的逐渐开放，政府对农民的集体行动不再单单采取压制的方式，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对农民的这种行为采取容忍和克制的态度。这样，在农民产生集体行动的需求，而且集体行动能够带来明显收益的情况下，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而当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性达到一定程度后，农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反而会降低，因为农民日益组织化，可以通过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社会运动等方式表达利益诉求，不必诉诸成本高昂的体制外集体行动。

邹谠(1994)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定义了“全能主义国家”：“政治权力可以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在原则上它不受法律、思想、道德（包括宗教）的限制。”党中央是中国的权力核心。党中央运用党的自上而下、从中心到边缘的组织，控制党员和全国人民的行为，控制社会的各个领域。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最大忌讳是，不能承认社会阶层的落差，不能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社会阶层的落差，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扩大。利益集团的存在，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升级。工农联盟是党的执政基础。工农之间的利益分化，使农民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如果工人、农民成立独立的、有组织的工会、农会，对党的领导将会是巨大的威胁。因此，党需要通过取消农业税、村民自治等方式提高农民的经济、政治待遇，同时要坚持对工会的领导，而农会则只能限制在经济合作的范畴内。无论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分析的独立工会组织，或是杜鲁门在《政治过程》中分析的农业利益集团，在中国国情下，都是不能容忍的。

赵鼎新(2006)指出，决定一个社会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的是一个社会中国和社会的关系。“变迁”、“结构”和“话语”决定了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变迁”指的是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引起的社会变化。“结构”包括国家与社会各自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国家的性质、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社会组织的发达程度，生产关系，等等。“话语”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参与者的认同、口号或话语策略，行动规范，等等。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中，原本不合法或半合法的社会运动（集会、游行、罢工等）都被合法化了，暴力手段不断减少，社会运动逐渐常规化、制度化，走向利益集团政治。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1960年代的西方社会有相近之处，但也有根本的不同。宋维强的《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一书，用源于西方的“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理论，用“农民生存状态”（“相对剥夺感”）、“政治机会结构”、“社会资源”等概念，分析了农民群体性事件为何发生，及其发展趋势。但在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结构或者蒂利

(2003)定义的“高能力的非民主国家”里，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性根源将长期存在。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或者说中国语境下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地考验着从基层到中央的各级政府。轮训县委书记、纪委书记、公安局长，反映了高层对于群体性事件高发的警惕和重视。“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后者的严重性正日益凸显。能否妥善处理农民群体性事件，影响到公众的政治信任度，更关系到整个党政体系的权力合法性基础。群体性事件从体制外转向体制内，从暴力化转向和平化，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必由之路。

宋维强著：《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群体性事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BOOKREVIEW 书评

山寨国

特约撰稿人 羽良（北京，priestliu@gmail.com）

在维基百科上，人们是这样定义“山寨”的：山寨原指山林中设有防守栅栏的地方，也指有寨子的山村。山寨行为，则指的是个人或团体对知名事物的粗陋模仿与改动而又自成一体。由此得到的事物，亦被冠以山寨二字。这样的事物可能是一种商品、建筑、活动或其它形式，通常表现为小规模性，非权威性，以及伴随非常规性的改动，如引入特殊的材料、方法，或者增加特殊的功能，以此迎合草根的需求。

这个定义，概括的还是蛮准确的。“山寨”这个词一夜之间被民众所接受，甚至津津乐道，按说的确迎合了当下社会大众反感堕落的精英文化，更包容了多数人犬儒式的反权威、反体制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山寨”这一貌似中性，略带调侃和自嘲的字眼，有着相当积极地意味。至少，于消解狂妄自大的国家崛起幻觉，不无益处。

但是，有很多人对此意犹未尽。他们觉得“山寨”除了解嘲功能之外，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潜台词可以大书特书，于是，“山寨”被冠以崇高的“革命”后缀，也要登堂入室了。在《山寨革命》一书中，作者隐约中，要把如今的山寨产业比成又一次家庭联产承包和乡镇企业式的伟大市场体制发明。进而，更将“山寨文化”奉为一种行将到来的产业化方向甚至

社会结构，加以论证和预测。从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手机，纵横古今中外，一直扯到未来的山寨社会，如同托夫勒式的一通畅想未来。至少，在作者气势磅礴的论证和演绎中，革命气概势不可挡。

华强北的神话

平心而论，《山寨革命》一书可取之处甚多。一些深思熟虑的精辟之见绝非坐而论道之辈可以凭空写出。显然，作者浸淫产业多年，不是一个拍脑袋的“马谡式”产业战略家。但细节的成功难掩全书的错谬和结论的轻率。

作者从深圳的华强北说起，那我们不放也从华强北说起。确如书中所述，传统手机行业大资本的技术壁垒，在台湾的联发科大举进入手机芯片业后被打破了。联发科在苦于得不到手机业一二线厂商的芯片订单后，转而不计身段，与大陆技术薄弱的手机小厂合作，最终形成了如今蔚为壮观的山寨手机产销中心华强北。这个山寨手机产业神话的关键，被作者解读成手机制造技术的祛魅过程。在作者看来，手机的制造过程，在解决了芯片、软件设计方案和生产模具的问题之后，就已不再神秘。一个曾经技术研发和制造工艺门槛极高的行业，瞬间变成可以任人“攒机”的贸工技主导行业。于是乎，遁着这个模式，任何貌似技术门槛奇高的行业，都可能如法炮制，山寨化，草根化，去品牌化。从手机到上网本，山寨好像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消费电子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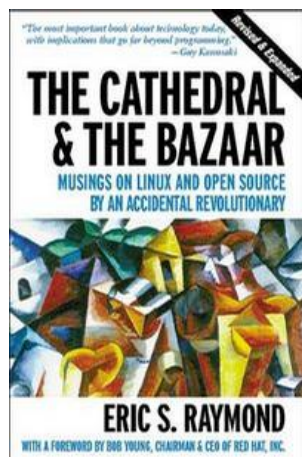
但如果把整件事换个方向看，山寨的气势就完全不是那么摧枯拉朽了。山寨手机业的关键，在于台湾的联发科这家公司能够生产手机的最核心部件芯片，且联发科在与行业巨头联手无门后才转而向山寨手机制造商出货。对联发科来说，联手山寨厂商，是回避行业门槛的市场策略，它并无意扶持和维持一个山寨产业。偶发形成的大陆山寨手机业，至今也无意染指核心技术，满足于快速模仿、快速制造、快速出货、快速回款的山寨产业链。在核心技术有求于人的前提下，山寨生产模式完全是一种不健康的经济模式。因为整个行业的生死，几乎都系于一两家能够提供成熟半成品的资本和技术巨头的肩上。所谓的“攒机”形态，并不是技术的祛魅，倒更像是在帮衬完成技术产品倾销的末端环节，赚取一些靠周转率挤出的快钱。

如此山寨模式，若以长远制度化的眼光去衡量，实不足取。片面强调华强北的神话，倒更有几分当年各行各业学大寨的“神韵”。以上网本为例，芯片巨头英特尔于7月底宣布，2009年年底之后不会再向上网本厂商提供 Atom Z 系列处理器的现货。对 IT 行业稍有了解的人一定知道，英特尔对品牌山寨化严重，出货量巨大的上网本产业极为不满。因为它极大的挤占了英特尔高端笔记本电脑处理器市场的销量和利润。所以，今年以来业界便一直盛传英特尔准备大幅度限制上网本用低端处理器的出货量。当然，它会留给华硕、Acer 这样实力强大的长期合作伙伴以足够的货单。但寄希望在上网本山寨化中捞一把的山寨厂商，显然不可能得到巨头的特别照顾，山寨上网本行业崩塌的新闻也终于开始不绝于耳。

山寨运动不是开源运动

《山寨革命》的作者很聪明的没有将全书的逻辑完全建立在华强北的故事之上。他从华强北的故事中，提炼出几项山寨经济的特征元素，作为进一步构建山寨工业模式乃至山寨化社会结构的基础。但任何故事都有不严谨的一面，概念的含糊其辞被一笔带过；举一反三的联想由于缺乏严禁的调查数据，也显得太过以偏概全。在全书的第二部分“山寨革命”中，“山寨”成了一个予取予求的筐，任由作者选择性的填充材料。

举例来说，作者为了论证山寨工业模式的可行性，找出了当年 Linux 操作系统和软件开源运动的案例作为证明。然而，作者显然没有认真读过开源运动之父 Eric Raymond 的名作《大教堂与市集》。开源运动的实质，是意在破除传统的、为大资本把持的封闭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造成的知识进步壁垒，采用分布式的、社会化项目管理进行技术创新。而山寨经济的本质则正好相反，它是一种无须细嚼慢咽的技术消化，也无须精雕细琢的工艺改进，只靠速产速销来进行低工艺含量的大规模复制。它无关技术创新，甚至是一种反创新的行为。作为彻底实用功利主义的生产模式，山寨对知识产权的无视，其出发点不是推进技术进步，而是



最廉价的享受现成技术带来的短期收益。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是人类未来可行的工业模式。

很多人，包括《山寨革命》一书的作者，都将山寨模式推而广之，与柳传志当年为联想打造的贸工技模式和 Dell 打造的零库存直销模式相提并论。貌似相近，实则相去甚远。贸工技的根本，是基于对自身比较优势的衡量，分配贸、工、技三项的权重，扬长避短；直销模式则是压缩生产流通销售环节的链条，以 B2C 的方式来出售产品，相当于制造商兼职渠道商，以提高产品利润率。贸工技也好，直销模式也罢，并不以透支现有知识产权成果为基础。而山寨模式，若狭义而论，只能算是一种极其粗糙的贸工技产销一体化模式。若广义来看，倒有几分囫圇吞枣的跃进味道。

山寨国无须“山寨革命”

“山寨”和“跃进”有什么联系呢？解释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先从几十年前的中苏合作说起。

就在阅读这本《山寨革命》的同时，笔者同时在读另外两本书，一本是著名冷战史专家沈志华先生的《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另一本是俄国军事评论员贝德勒·普耶洛夫斯基写的《日落共青城》。也许是巧合，这两本几乎同时出版的著作，算得上是中文文献中“唯二”的两本大篇幅系统介绍中苏同盟时期，苏联对华进行军工技术援助的著作。基于大量已公开的前苏联解密档案和中方部分已解密档案，这两本书都翔实的介绍了苏联援华的工业项目数量、行业分布以及项目历史。

在中苏同盟的蜜月期，苏联方面以近乎无偿赠与的方式，将当时苏联掌握的大量成熟甚至属于很尖端的工业和军事技术资料转让给中国。同时应中方要求，派出了大批高素质专家，进驻中国整个工业和军事部门，进行技术和管理指导。其转让资料之丰富，专家介入中国国内建设程度之深，在全世界范围内亦属罕见。也因此，中国在 1949 年之后，以一穷二白的软硬件基础，迅速完成了初步工业化，在军事方面，更是依靠“全面学习苏联专家”的山寨精神，成为当时惟一个能够大规模自行制造喷气式战斗机等一系列堪称现代化武器的第三世界国家。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回，中国此前意欲通过全面模仿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破灭。而在苏联大力帮助下建成的军工业体系，在此后三十年中，几乎毫无进步。直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中俄基于各取所需的互补利益开始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合作后，俄罗斯的军事专家和情报人员惊讶的发现，中国的军工和科研体系，在这三十年中，几乎依旧保持着三十年前的形态。所有科研单位和军工相关企业，研发新装备严重依赖于获取现成的国外装备，加以逆向测绘仿制。在基础科研上，几乎没有预研等系统化、制度化的基础技术储备流程。以至于每每打算进行新型号飞机的研发，都必须从最基础的项目做起，一个项目拖上二十年甚至更久，屡见不鲜。从提出装备指标要求到装备最终完成定型，时间之长远超苏美等国，最终，新装备可能尚未出世，便已大大落伍于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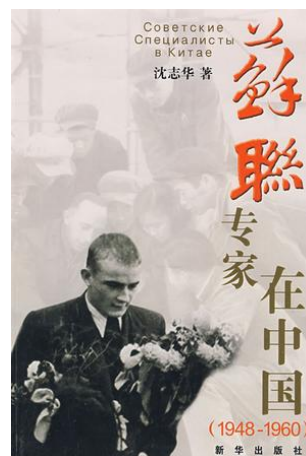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讲一个看似无关的故事，只想说明两件事：一是中国这几十年来，历来是一个山寨国。中国的整个工业化体系和军事现代化过程，高度依赖于外部技术的输入和仿制。自主创新的含量非常之低。而曾在短期之内取得的惊人成就，其实完全就是今天山寨产业的国家计划经济版本。一切科研组织和生产组织，都围绕着一个目标——尽快复制国外成品——来构建的。以至于这套组织体系，其自身的创新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绝大多数智力成果，就是“复制”，或者曰——“山寨”。二是中国的“山寨”方式，对基础科研的挤压和损害，延续至今，并没有实质改变。从 GFW 到飞机发动机的核心机研制，再到各类疾病特效药，无不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现成成果。几十年山寨下来全部的进步，大概也只体现在一些应用层面的东西上。

事实上，这才是真正一直伴随着当代中国发展的“山寨模式”。华强北的神话与这种国家级的“山寨”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不过是加入了国际贸易成分的“军转民”。也正因为此，我才敢说，《山寨革命》书中鼓吹的“山寨模式”，本质上是缺乏创新力的

跃进，只求成品，不求甚解。

当然，与当年集举国之力搞“山寨”不同，今天中国的“山寨”，的的确确充满了反权威的草根精神。而这个权威的具



象化，应该就是诸如手机产业中工信部这样四处制造审批政策壁垒的“有关部门”。山寨厂商们在蔑视技术权威，肆意拿来主义的同时，当然也可以蔑视“有关部门”的审批讹诈。在这样的“山寨”中，底层民生似乎也的确通过山寨产业，得到了些许缓解和喘息。就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些并不出名的“山寨民生”一样，“山寨”其实只是庞大威权经济低端食物链上的小商人与小百姓谋利谋生的无奈选择。无疑，这是中国的“山寨文化”最可歌可泣的一面。但，这与想象中那场磅礴的“山寨革命”无关。

阿甘著：《山寨革命》，中信出版社，2009年7月。

SOUND 声音

克莱本钢琴比赛 DVD 杂记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huiyuanma@gmail.com）

最近有机会就看音乐 DVD。其实从听的角度，效果不算理想，不过既然音乐是一种生活，音乐家的音容也该在某些时候被关注。印象最深的，竟然还不是大师们的演奏，而是一张 2005 年克莱本钢琴比赛的实况录像。中国选手陈萨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第三名。

作为旁观者看音乐比赛的“角逐”，真够冷血。音乐变成体育，本来是巨大的讽刺，但也并非毫无意义，它毕竟把人逼到悬崖边上，用体育精神也就是极端体验面对优雅的音乐，这是考验、扭曲却也榨出人的潜力。他们那沉重的疲倦、失望和狂喜，在其他音乐场合难得一见。音乐作为一种生活，此时显出它的残酷、世俗、功利的一面——也许这本来就是艺术的一部分。

拍片过程，没人知道谁会获奖。有个意大利家伙 Cabassi，我认为弹得最好，进了决赛可惜没有获奖。这家伙给我印象深刻，有真正艺术家的意思，声音轻松优雅，似乎不刻意得失。决赛他弹完后他轻松地说“我高兴它总算结束了”，人家问他感觉会得奖吗，他说 I don't care 就急急忙忙拉着小朋友去游泳了。他和获冠军的俄国小伙子成了好朋友，宣布结果的时候他没显得沮丧，而是热情地祝贺朋友。比赛之前，记者问他认为自己和别的决赛者有何不同，他说 I'm the most beautiful one，在我看来这是实话呀。这位大人络腮胡子，卷发，有小小的啤酒肚，看上去不娇小、不逗人喜欢、不好玩、不古怪，甚至不像钢琴家。

而 19 岁的韩国小姑娘 Joyce Young，最终得了第二名，弹琴却是那么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真让人不喜，用朋友的话讲是“暴力钢琴”，只顾让评委印象深刻，但无法在录音中细细品味。这样的演奏如今何其多哉——比赛的弊端，正在于此。在我看来，钢琴本来是打击乐器，不暴力也暴力，那么凶狠地敲击，实在更加可怕。唉，韩国人最近获奖者无数，怎么没有一个特别富有音乐的钢琴家？他们似乎榨干生活中的全部能量来练琴、比赛，看上去是在痛苦地拉伸自己。

虽然不喜欢她的演奏，但因为片子中她的镜头太多，那么鲜活的一个人，我不可能不受感染，比如她说自己少小离家，父母为她做出的牺牲，比赛逼迫下的巨大投入等等。她这样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如果没记错大意是这样的，“我们从小就用音乐表达情感，然而正常的人的情感到 18 岁左右才可能成熟，这样的不同步，有好也有坏的一面。”

这话在我看来很有启示性。音乐世界浓缩了太多情感，弹琴的小孩，有没有情感都要强颜欢笑。有些格外敏锐的孩子，能从音乐中创造出他没经历过的东西，或者从类似的经历，创造出“需要”的情感。这样的情感和演奏，到底是真还是假？或者说，艺术和“真实”，到底哪个更真实？理论在这里似乎不太起作用，因为各种例子都有。在大师们中间，有人饱满地生活着，一边经历一边表达，而有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似乎也爆发出压抑之后的巨大能量。音乐这东西，既相当程度地独立于思辨，又体现思辨的力量。

其实，音乐比赛的特别之处也体现在这里。观众面对的不是久经考验的大师，而是尚未取得话语权的小小天才。这对



乐迷也是一个考验，不但要放弃成见，还要暂时抛弃音乐中“形而上”的那部分，观察音乐的“操作层面”。精神和技术的关系在操作中显得关系间接、充满偶然。

而音乐最打动我的地方，就包括这个“操作层面”的努力，那是长年累月的苦修式进阶，任何人凭想象都不能复制这个历程。这个历程中包含大量理性分析的努力，不然不管是演奏还是欣赏，都走不远。仅凭悟性和乐感，面对复杂音乐时撑不了多久。其实，老师的教学，本身就是文本语言和绝对声音之间的对话——这是一个互动、探寻、思考的过程，其基本媒质当然是语言。很多老师，也在“不能言传”的困难下止步了。不要说分析作品和风格，仅仅是把“音乐潜质”发掘出来，也需要理性的设计和方法。假如古典音乐不是这样复杂，大家会有这样的错觉：音乐是自然的、情感的，但它的艰难终于把人的天赋不能及的一面暴露出来——如果希望进步，把美好的东西表达得让人能够感知，就要长期分析研究，不断用后天力量调整自己。而普通人的倾听，与之并无本质区别，因为演奏家努力表达的，也是他们非常期望听众注意到并能区分的。音乐中的技术给人的意识制造方向，不断打开想像的空间。

比赛结束了，小天才们各干各的去。跟体育不同的是，他们的生涯才刚刚开始，也就是说，这个技术、精神互动互博的漫长历程，仍将和音乐同在。但愿音乐在竞赛中显露的残酷，可以在真正的生涯中软化为慰藉。

独立阅读两周年

内心安定，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

观察员 朱白（广州，zhubai@tom.com）

自从那天下午戴新伟在 MSN 上跟我说，以后每个月学他的样子写一篇阅读报告后，我就从来没有不忐忑的时候。一方面内心充实有事情做，另一方面懒惰常常导致误工，每到要交稿的期限，我电脑的屏幕里就会反光出戴新伟那张时而笑嘻嘻时而严肃紧张的脸。

说实话，在参与写这份报告之前，我甚至并不知道世上有这样一份报告。我一直以为在这个人人都在争名夺利和唯利是图的年代，大家尤其是那些聪明人，都应该在为名和利做事，在为所谓的前程和事业打拼，怎么会有人在干一件丝毫见不到功用的事情呢？

慢慢开始写了，才发现很多爱看书、但又不至于矫情的人，他们似乎跟我一样，看着自己喜欢的书，有时候并不在乎这样做能带来什么。我总能从大家的“报告”中发现太多的“无用”，这种“无用”在今天看来已经罕见，至少在功利和唯利是图的今天“无用”已经在被自然淘汰，它成为了人们最容易被放弃的那个天使。或者只有在—群“有趣”的人里，才会把“无用”想像成天使。我不知道其他作者是否同意，反正在我看来从每期“独立阅读”中洋溢出来的这种“无用”之美，已经表现出迷人的气质，那些放弃所谓功用的文字，其实并不是真的百无一用，而是自然地剥落了那些跟浮躁和轻挑有关的用途。

其实在我看来，写书评压根就不是什么正当行业，它甚至不应该被当成一个职业，最好是兼职、临时工什么的，不把它当成安身立命和维系生活保障的差事就对了，因为干这个活儿实在是需要一点闲情和雅趣，不能直接地想着通过它而得到什么。在我见过和没见过、了解和不了解的“独立阅读”作者里，我始终保持着这样的一个幻想，他们都是最恰当的书评人，因为他们在此之外都有另外的身份——这是保证“独立”的一个前提。如果有人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了一件事上，还能想像它会独立吗？

与其说是“独立阅读”的一个作者，我更愿意作为它的一个读者，阅读的趣味比写字的趣味大得多。当初拉我入场的是戴新伟，他为了大隐于市在自己那郊区的大豪斯中苦心专研玺印技法，而将我推上前台，既是对新人的提拔，也是摧残（每月一篇对于我这样的懒人和不严谨的人来说，还是颇费心力的）；后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从上海过来广州的王晓渔的当面鼓励，那次之后我心想，晓渔，您一定会后悔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晓渔的鼓励其实是纵容了我（我在报告中经常以轻松抒情的方式而不是严谨评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懑和不满，这非常狭隘、局限，我知道）；再后来能每月按时完成报告，是因为成庆的敦促和提醒，让我不至于太过于偷懒（我总是觉得偶尔可以闭气装死蒙混过去，大家可以忘了我这

一篇报告，但事实上这样想的压力更大，而且更无法得逞）。

卡尔维诺在《烟云》里说：“我愿意让我周围的一切都是临时的，不安定的，只有这样我才能在内心感到安定。”我觉得在广州生活和为“独立阅读”作以观察家姿态地写稿，都让我有了这种内心安定的感觉。内心安定是个怪词，它有点无聊，又有点无用，但我非常喜欢，至少此时我觉得它是一种尚可追求的境界，尤其是在流动的、临时的周围里局限于自己的内心安定，这真是非常迷人。某种意义上，“独立阅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内心安定的现代公民。

趣味的雅集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两年前，与成庆、苏小和、戴新伟诸君筹划“独立阅读”（当时叫“中国独立阅读报告”），首先明确了一个共识：“独立阅读”是一种趣味，不是一项事业。“事业心”就像“世界观”一样，属于我一直敬而远之的词语。创办“独立阅读”，不是为了制造群体效应，打入或者控制书评领域。恰恰相反，我们想从饱受书评折磨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办一份自由自在的电子读物。最初，戴新伟将每期“独立阅读”部分文章刊发于他编辑的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后来，我们每次拖拖拉拉，完全不遵守纸媒的节奏，渐渐淡出。

虽然写过十几二十个专栏，也出过几本书。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最有趣味的文字流落于博客和“独立阅读”。原因很简单，这两种写作都是无用的产物。同样一个题目，如果是博客，我会写得眉开眼笑，一旦媒体约稿，就会辗转反侧，删了又改、改了又删，判若两人。写作的效用和快感，永远是成反比的。

“独立阅读”的报告文体，也来自博客。我每隔几天就会去一次书店，一个读书人看到好书，自然有与同好分享的愿望，但我又懒惰成性（趣味论者，往往是懒惰者），不太愿意也没有精力一本一本地去写书评。于是，我在博客上写点新书线报，每本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没想到这种浅薄的、与媒体书评完全不同的文字，获得很多网友的反应，他们的跟帖非常专业、具体。为了看到那些跟帖，我不得不间歇性地写点这种线报，以便抛砖引玉、引蛇出洞。也因为这个原因，在筹划“独立阅读”的时候，我提议以报告文体作为主打，获得认同。

编辑“独立阅读”的过程，是一个雅集的过程，不是聚义。雅集，重在臭味相投，臭念 *xiu*，臭味有趣味的意思。雅集没有什么明确目的，就是三两闲人呼朋引伴，杏花疏影里，“吹牛”到天明。如今杏花疏影难觅，网络便取而代之。聚义，是几个人拉上一杆大旗，四面八方闻风而至，有江湖好汉，也有鸡鸣狗盗之徒，共同起事，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雅集和聚义没有高下之分，但是“独立阅读”本是因为趣味而生，自然也就追随趣味而去。

迄今为止，“独立阅读”的撰稿者有二三十位，比较固定的有十几位。很多是旧识，也有一些新知，但两者很难区分，因为新知常常一见如故，等于旧识。比如朱白是戴新伟推荐，言一是成庆推荐，当时我对他们一无所知，虽是朋友推荐也不免半信半疑、半推半就，但读了他们撰写的报告，立即成了他们的粉丝。趣味是最好的粘合剂，陌生人也可以无缝对接。当然，趣味也有缺点，缺乏功利性的诉求，往往也就缺乏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更何况，趣味论者不仅是懒惰者，也常常是懒散者。但相对于让人敬而远之的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我更愿意把懒惰和懒散视为保持趣味所要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因为重在趣味相投，所以“独立阅读”从不宣称兼容并包，而是强调底线共识，“独立阅读”的底线共识可以归纳为两点。有事业心的同志经常制定人生的最低目标和最高目标（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这里也东施效颦一下。“独立阅读”的最低目标是致力于独立书评的程序建设（详见每期开篇刊登的细则），最高目标是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这两个目标同步进行，没有先后之分。一个认同公民社会理念的人，如果连独立书评的规则都无法遵守，最终可能成为演员、官员、精神分裂者，却不适合成为一个作者。“独立阅读”的作者，愿意从独立书评开始，践行公民社会的理念——这不是口号，而是趣味，趣味是不必多说的，就此打住。

阅读的公共性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独立阅读》一晃已经两岁,这份由三四同仁无意间“拼凑”出来的电子期刊,论其初衷,只不过是“媒体写作”的不满,与其接受媒体的命题和文体的要求,不如作一次自由写作的试验,自己办刊,自己发文。

虽说是文体的试验,却也需切入点来作经营,把阅读作为刊物的中心,本意绝非是作一份纯粹的读书推荐,似乎可以阅读为名,以推介为媒,就可以在出版文化产业的中下游市场占据“基地”,作一番文化资本的累积。而我们的初步想法,只不过是想要在自己打造的“山寨”平台上,为一个尚不存在的体制外的文化空间里提供一些不同的声音而已,如有读者的响应,那也只能算是意外的收获罢了。

从表面上看,阅读是私人事宜,涉及到个人知识与心志的建设,不过,阅读其实也具有公共的性格,一是因为阅读要与不同作者作一番跨越时空与空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性格”本身就要将个人与阅读的关系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再则是因为,阅读从其本质而言,其实是一种面对世界的方式。不过今天随着阅读作为一项社会活动的(或产业)不断发展,以致于阅读本身逐渐抽离出语境,阅读也就逐渐与社会开始疏离,最终成为书本与书本之间的链接,沦为一种知识与信息的简单传递过程。

因此,一旦当我为《独立阅读》写作思想哲学部分的阅读报告时,便会有意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努力。介绍思想,初看起来,只需将每个人的著作作一番简要的背景与观点的引介,但是细细想来,何种著作是否重要,究竟要用何等标准去权衡,其实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要让阅读回归其本意,或许要让“人”与“世界”回归前台,哲学不是哲学史上的学说嬗递,而是不同世代的人对同样的问题的不断追问,哲学不是依靠学院的专业来作区分,而是端视阅读的人是否拥有一种对自己的存在不断发问的热情。

当然,我的这些见解未必就能获得《独立阅读》同仁的同意,不过之所以大家还能“和而不同”,或许还是因为“阅读的公共性”这个目标。这一目标,是想通过个人的视角去开启公共议题的讨论,我们所理解的所谓公共议题,并不只是政经时事新闻,还要涉及到人生意义的发问、审美情趣的探索等等这些精神领域的议题。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只要看看今日大部分的文化事件与活动,就可以发现,今天的文化生产基本只有两种形态,要么是“文化搭台,政治唱戏”,要么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体制外的文化努力从个人角度来看,是个人的话语与思想资源的重建,从社会角度来看,或许是一种反对垄断文化体制的集体努力。《独立阅读》自然无法独自担当这样的重任,但是我们的阅读与写作,或许都有意无意地在为这个目标贡献力量。

或许这里并无必要过分拔高《独立阅读》的立意,毕竟阅读对于我们这些同仁而言,近乎是一种日常的本能,如空气一般,须臾不可远离。这也就注定了,阅读首先是一项个人的事业,无论是价值的寻求,好奇心的满足,都是高度个人性的选择。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在今天这个价值选择、审美趣味多元混乱的时代,阅读也是一项具备公共性格的事业,与这个社会文化的整合与重建密切相关。

《独立阅读》是否真的拥有这种公共性格,恐怕还有赖于各位读者的检验与判断,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独立阅读》正试图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微物之光

观察员 言一 (成都, richard7briner@gmail.com)

06年的夏天,我坐在长途车靠窗的位置读洛伊(Arundhati Roy)的《微物之神》。车上的冷气面对为数众多的人口显得十分弱势,窗外的热气却恰好将我带入了那个同样炎热的国度。我是在经历了前面长达几十页的崎岖坎坷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间进入到洛伊用种种细微构建出的迷宫;而我更是在3年之后才意识到,这本小说是怎样地影响了自己。

我是个念旧的人,却不轻易开启回忆。但在那些为数不少的眼神放空时刻,我偶尔也会回想来路,并感慨自己的幸运。

若不是一路走来认识的朋友，自己大约迎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这话看起来煽情，且属废话。但用在我身上却无比真实与贴切。假如我不曾遇到雅克、和睦尘与勘笑，搞不好我现在正埋首于 NBER 一篇又一篇的经济学文献，而不是坐下来写关于独立阅读的两年。

每一个朋友，几乎都为我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常常，那会是一个被我遗忘，或是不曾遇见的世界。

在小酒馆的放映现场，导演盛志民谈起自己为什么要拍《再见，乌托邦》。他说：这是借由对与自己有过相似经历甚至是共同经历的朋友的采访而完成的对于自己的一个梳理。这样的答案是诚恳的，也是主观的(好比电影中的主观镜头)。因为它仅仅道出了这部电影对于导演的意义，却似乎忘了观众的存在。然而，观众确实不是拍摄时所考虑的重点。对于这部既无法登上国内院线公映，又不打算通过 DVD 或者网络视频发布的影片，能够看到实属某种缘份。只是，对于那些有缘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而言，这部作品或可成为一道特别的亮光——也许，会有那么几个，几十个观众在看了电影之后愿意去了解那个建国以来最为理想主义的十年；也许，会有人去反思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这是一道微弱的光，仿佛是透过略微开启的某扇大门而来。有人推开了门试图接近光源；有人安静地欣赏着光本身。

由于旺盛的好奇心，在大多数时候，我属于那些试图接近光源的人。我常带着园游会的心境挨个品尝某一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亦曾戴上放大镜悄然追寻在 20 世纪初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曾经飘荡着哪些人的身影。无论小说，电影，音乐，绘画，抑或其它作为被“阅读”的客体出现的各种作品，在我看来皆可被视为广义且微小的“物”。通过直观体验或是静心阅读去感受这些微小之物所发出的微薄而美丽的光彩，也随之变成了我心目中世上最为有趣的事情。

正是在这种沾染了些许猎奇意味的“恶趣味”驱使下，我一开始便被《独立阅读》报告文体所吸引。如果说当初我对报告文体的认同是一种“生理”反应的话，那么两年后我则对报告文体的特质有了更多体会：

因为是报告，所以不会就某本书进行全面点评，突出的一定是观察员体悟最深或是最渴望的表达。这与巴赞的“作者策略”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是报告，所以有足够的空间选择与当下时事呼应的著作(“物”)来书写，从而使得报告本身具有了“评论”(Review)的性质。

在阅读和体验的过程当中，由于作为“主体”的人这一“介质”的加入，导致了为数众多的光学(折射，反射，衍射，偏振……等)现象的发生：在把参与其中的“人”变成“发光体”的同时，亦使得“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光彩变得更加斑斓，使得“光谱”不再明晰，充满变幻。“人”与“物”的交错，似乎变成了一个可以引入结构主义来分析的现象。而对应到独立阅读报告的撰写上：报告观察员在写作时所面临和经历的取舍与编织过程，在我看来甚至要比独立阅读的宣言本身更加接近“独立”一词的内核。

就像陈绮贞老师不知道要看过多少风景才能真正明白旅行的意义，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期的《独立阅读》才能达致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但同样的，就像其实旅行本身就很好，能持续地发现那些美丽的“微物之光”就很好，能自由自在地阅读和书写也已经足够好。

时值创刊两年，我十分以及无比地想抓住机会表达一下自己对诸位独立阅读风景缔造者的仰慕之情以及诚挚谢意，但又觉得话说得太直白就会了无生趣，只得按下，默默寻找公民社会下的贴切表达。

从独立阅读开始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独立阅读》有一个结实的广告词：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心有戚戚。记得是多年前的一个傍晚，我在北京西郊某个狭窄的阳台上看着夕阳渐渐睡去，忽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是的，那一时刻，巨大的黑暗蔓延过来，我第一次承认，我不知道我拥有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经失去什么，我不知道权利，也不知道自由。我空有一堆乌有的情绪，这些情绪像一只草率的野狗，仓惶奔走，无端愤怒，我终于承认我是一个彻底没有常识的人。

我愿意把这样一个黄昏当成我独立阅读生活的开始。越几日，广州的戴新伟君竟然请我写一篇书评，他给出的题目，是阿玛蒂亚·森的《饥饿与公共行为》，电话里，他说是上海滩上的王晓渔推荐。那一时刻，我何其诚惶诚恐。一个星期后，我人生第一篇书评诞生。

真正的独立阅读生活就此开始。几个孤独的读书人彼此喂养，结伴而行，几年之后，我们竟然创建了一份真正的民间阅读刊物。虽然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我能看见王晓渔在一堆繁复的史料里刨开的思想，我也能看到成庆坐在音乐厅里，优雅地切开古典音乐。至于戴新伟，我知道他总能找到最好的书，他在不同的书架上游走，然后把大好的阅读信息带给我们。他是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里最细腻的读书人。

生活从此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生态！我靠着独立阅读改变了自己。

现在，我经常想起我过去的荒芜，单薄和苍白。我想我漫长的生活其实一直与独立阅读无关。记得小学阶段，我读到的第一本书是《柴油机原理》，因为我父亲维修柴油机，这本书是他的工具，文字不多，可是关于柴油机的图画很多，我一直拿它当小人书看；有一次我还读到了一本完全没有书皮的《七侠五义》，可是里面好多繁体字我根本不认识，只好求父亲帮我讲，这一讲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父亲讲完这本书，兴致大发，接着给我讲了薛仁贵征西、商纣王与苏妲己的故事，现在看来，如果没有父亲当年的故事会，我想我的童年时代是一片空白了；有一次一个远房兄长来我家，贼头贼脑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发黄的、前后差不多撕了一半的书，并告诉我书的名字叫《六十年的变迁》，我嚷着叫他借给我看，他说这是禁书，拒绝了我的请求；对我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是《鹰击长空》，我忘记了作者的名字，认真看完了，满书的形容词，笔法很激动，符合我当时的口味，我甚至把书里面的优美词语一个个抄录下来，然后想办法用在我的作文里。

如此狭窄的阅读经历，显然不足以支持我独立思考。许多年以后，我细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在第三章读到了森对三种价值观的比较性分析。森的阶段性结论意见让我豁然开朗。

“每种派别的长处和局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考察其阅读基础、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来理解”。

森强调了自由阅读的重要性、扩大信息基础的重要性，这种强调很对我的心态。基于阅读产生的信息基础，直接影响着我们的思考习惯和方法，在一个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我们的方法可能是片面的，我们的观点有可能是无效的。

生活中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我的朋友叶，来自台湾某商学院，他在市场营销方面有自己的阅读体系。一次企业家沙龙上，他听内地一群学者和企业家大谈商业文明，大谈宪政建设之后，有些遗憾地说道，“我完全不能想象，一群企业家竟然在这么好的沙龙里谈论政治，谈文明这样虚幻的东西，今天的台湾企业家在一起谈论的，永远都是利润，是如何赚取利润的方法。”

清华大学的金融学教授朱先生，在给学生讲述企业的金融问题，尤其讲述企业如何完成私募的时候，话题带到了今天的大学校长应该怎样定位。朱教授的结论很简单：“大学校长是干什么的，大学校长是为这所大学到处找钱的”。

杨鹏是内地研究中国政治生态比较有影响力的专家，他提出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是公共产品的缺失，这样的观点让我心仪。他偶尔会读一读我写的本土企业模式案例。见得面来，杨先生说，“你观察并写作的本土企业商业模式价值不大，尤其是在今天我们没有解决商业文明元制度的前提下，更是没有价值，中国企业哪有模式可谈？”

同样来自台湾，费先生和我有过一次关于媒体的使命与责任的沟通。他说：“我知道内地的媒体朋友向往新闻自由，但我提醒你，台湾新闻自由之后，引来的是一大批媒体的死亡，媒体作为一个产业，它所发生的变化几乎让人接受不了。所以我劝大陆的媒体朋友多思考一些媒体的定位问题、市场的细分问题、受众的接受问题，这些技术性的问题，是媒体能不能活下去的重要问题”。

上述观点放在一个狭窄的阅读范围内，应该说都正确，但把阅读范围拉开，则很轻易就能看到其不足之处。现实局面正是拉开性的，阅读的范围问题无限外延，其限制则无所不在。如同森所言，考察这些观点的信息基础的范围和限制数据，就成为我们的必要功课。

叶教授的信息数据哪里出了问题？我想他是用目前的阅读数据掩盖了他过去曾经储存的阅读数据。人都是容易健忘的，我想叶教授也不例外，他把台湾过去发生的历史信息丢到回收站里了。

金融学教授的阅读渠道主要来自他的专业，这种与众不同的长处经常会得到企业的回报，如此，他便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信息数据放大并复制到了其他领域。我听完了他的观点以后，问了他一个问题：如果蔡元培先生还活着，你认为他会认同你的观点吗？

杨鹏的阅读数据有局限吗？他对我的工作的否定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我自己经常生出工作虚妄之感。但杨的方法在这里仍然是扩大了他的个人阅读数据的价值，并用他的信息体系轻率地覆盖了我的信息体系。很多批评性工作可能都在沿用杨鹏的范式，并且这种范式的强权性非常隐蔽，隐蔽到连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不到。

费的信息支持我想应该来自于一家媒体的经营范围。媒体是经营单位，是企业，这是常识，但媒体是公器，也应该是

常识。这么看来，从事媒体的人在阅读时，其范围更大，而限制显然要更少。这就是做一个媒体人的难处，曾经听说有人谴责默多克在东亚的投资放弃了信息自由的底线，主动迎合强权的信息限制，而默多克对此不屑一谈，他说在他的企业里，他有处理信息的自由。默多克为了利润，或多或少把自己的阅读视野主动收缩了。

如此看来，做一个真正的独立阅读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坚守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应该从独立阅读开始。某种意义上，我对中国的阅读，正是基于这样的局面开始小心翼翼地工作：我不仅要去除来自意识形态方面的阅读障碍，也要去除来自商业方面的利益遮蔽；不仅要防止群体性的盲目阅读，更要防治个人阅读上的画地为牢。我的阅读是私人性质的，但我的阅读视野却要努力拓展。我需要选择，需要交流，也需要坚守，这其中的困难不言而喻，但独立阅读中国的快乐也在这里。

哦，中国，这苍茫的土地，这佝偻的人群，在我的眼前缓慢铺开。这熟悉又陌生的风景，堆积在历史里，我听见一个国家古老的叹息，也听见一个个具体的生命残存的悲伤。多少年过去了，我以为历史就是帝王将相和农民起义，但是今天我读到了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是的，每个人的生命和权利，这是我阅读中国、阅读自己最醒目的路径。这是一条具有经济学意义和人文意义的优美之路，我和我的朋友们彼此喂养，结伴而行，渐渐长成了一些有常识的人。

读书之叹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fei.yan@green.oxon.org）

大概是因为自己这十年来都一直身处大学的缘故，再加之为自己所规划的职业发展，读书成为了我每天必修的功课，书店和图书馆也成为了我平时去的最多的地方。书读的多了，就自然会被朋友套上一个“读书人”的大帽子，然后再殷切地附加一句，这年头，坚守的读书人已经不多了。

这句话如若仔细推敲一下，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感慨浮躁升腾之下读书人的种种不易，更有种将象牙塔里谋生的人等同于读书人的想当然。在很多人看来，做学问的必然都是皓首穷经，必然都是嗜书的“瘾君子”；而大学，因为其独有的人文主义气质和丰富的图书馆资源，也就成为了所有读书人心目中最值得向往的读书场所。如果每天的工作就是随心所欲地读书、信手拈来地读书，岂不快哉？

然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快哉”只不过是一个对于大学和大学教授这份职业过于善意的臆想罢了。随着在学院的圈子里待的愈久，我反而愈加深感“读书”是一种痛苦，而且这痛苦正在渐入骨髓，大有侵入肌理的趋势。当每天埋首于成堆的资料和书本之中，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篇研究性文章的文献综述而机械式地找寻自己所需要的论点和论据时，我开始明白，我只不过是鲁迅笔下的职业读书者罢了，连半个读书人都不是！

鲁迅曾在《读书杂谈》里将读书分为两种，一种是职业的读书，一种是嗜好的读书。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读书并非因兴趣而发，而只是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有微妙的利害关系，有排他的功利性，也有现实的紧迫感——文章发表当为首要，这关乎到是否可以保住饭碗，是否可以获取职称资格乃至终身教职的关键所在。于是各种为迎合发表的“快速通道”、八股模板，乃至抄袭剽窃应运而生，而各种占山为王的学霸学阀也成为资源利益分配之下人人挤破了脑袋溜须拍马的学术主角。这样的读书，充其量只是为了给个人的名片添几个头衔，给大学的门面镀一层薄金，而其累加的破坏力却难以忽视。蔡元培先生 1918 年在北大开学演说中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然而遗憾的是，蔡先生理想中的大学治学之精神而今早已失魂落魄，大学独立之风骨亦已荡然无存，“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反倒比比皆是。

后来自己选择来到香港，曾希冀这里可以不受各种既有潜规则的约束，自由地去读书。跟内地相比较，香港的学术规范自不待言，学术资源更是有着天壤之别，而内地学界的种种痼疾也因“一国两制”挡在了门外。然而几年的香港学院生活待下来，却感觉香港大学在制度上的僵化，以及过于强调教授职业本份之后在文化创造性上的束缚。因为与国际接轨的缘故，只有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论文才被接受为著作成果，所有中文作品都只是个人兴趣之上的添头。我突然发现我又陷入了另一个囹圄之中，每日的工作就是写一些洋八股，而香港整个大的学术气氛，则是关注于眼下的利益得失，至于文化上的承担、精神上的探索，都被束之高阁。大学教授们聚在一起，讨论的最津津有味的话题是楼市、股票和马经，并引之

以为快。教授们这种市井的即食心态是脱离不了香港过于强大的城市商业特质的，按照陈冠中的话说，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眼界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到头来，大学教授只发论文不读书，也就成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读书就必须囿于象牙塔之内两耳不闻窗外事，但至少，读书得有一个底线和自我，有自主的独立选择，有“沉潜往复，从容含玩”般只求阅读的简单乐趣在，而非仅仅只是为稻粱谋的勉强。我热爱读书，但也看到自己的痛苦。我想着治愈这份痛苦，想着做一些坚持，甚至如果可能，还想着通过个人的阅读与分享以分担他人的痛苦和困惑。而这，也是我当初听闻独立阅读初创时的构想与理念之后，就毫不犹豫加入其中的初衷所在了。

这个选择今天回头看去，是多么的正确。

书评、书业与《独立阅读》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不知从何时起，养成了阅读书评的习惯。这种习惯具体表现在：购读读书类的刊物；拿到一份杂志，先读书评版；如果一份报纸没有书评版，就觉得是不完整的，感觉就跟没社论似的。最初是无意识的，但读着读着，就变得有些强迫症了。在国外的時候，从报摊买来外国报纸，居然也先从后往前翻——找书评看。

之所以对书评如此狂热，是由于对书和书业的狂热。一方面是自己的时间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书店的购书环境也确实太糙（这样说，可能会“伤众”。但我说的是事实，除了北京的万圣书园和上海季风书店等少数店家，国中书店能激起我“逛”的欲望者少之又少），虽然常去书店，却绝少恋栈。一般有明确的目标，直奔主题，敛完就撤。或者去附近的咖啡厅小坐，一边啜饮法国碳烧，一边拿出囊中物，一本本摩挲。目标的锁定，除了几种趣味期刊外，绝大多数来自对书评的阅读。如此这般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浏览书评，并定期去书店，又比较不吝在书上花银子的话，那你基本上就不会落下什么。代之而来的问题是，府上的空间就堪忧了。寒舍已经到了书山蔓延到餐桌，吃饭要搬个方凳，仅占原本很大的餐桌的一角的地步。

读书评，读着读着，便能读出问题来，除了书业的问题，还有书评本身的问题。先说后者：中国的书评刊物常演“变形记”，很少有始终如一者。当然，也许从办刊者角度出发，变乃与时俱进，是正经，一成不变，才奇怪。但我说的变，是那种不靠谱的变化。所谓不靠谱，即离谱。而“谱”是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是书，既然被称为“书评”，理应拿书说事。“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以此来观本土书评刊物，几乎都是“君子”：不信，你把各个时期，不同开本、体例的《书城》比较一下看看。著名的读书大报《中华 XX 报》，早年一度是必读纸，因出国，中断了两年。回国后，再次展读，吓了一跳，动辄整版、乃至数版的是关于某部刚刚出版的“献礼工程”、某权威汉语新词典的“书评”，还有领导、专家发言什么的。京城有份颇有名气的书评刊物，随报发行，一周一期。几年来，我眼瞅着它如何从一份在文化圈内有一定影响力的书评纸，变成了一份专事“新书推介”的信息纸，版面和文字的篇幅也越来越缩水。

再看前者。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的出版业似乎也在迅速“崛起”。但表面的繁荣之下，随便到坊间一看，便会发现，相当程度上在炒旧的。八、九十年代出过的书，换个包装，重新推出，版权页上则一律示以初版。这种“猫腻”，对二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往书店扔银子的笔者来说，内心多少有种不屑：难道这就是你们所谓的繁荣吗？难道这就是业界老总们常挂在嘴边的、动辄打造出版航母，不惜把蛋糕做得更大的结果吗？作为读者，作为内容产业的消费者（同时也是卑微的生产者），我感到羞耻。

而最令我感到羞耻和怪异的，是本土图书的开本。不知从何时起，开本越做越大，动辄就上异型本，仿佛非大开本不足以成就畅销书似的。同样的版权书，有的已在国外先购得日文版，再看中文版，极端者能比日文书大两圈、重一倍。我不知道，我们何时、何以酿成了如此不堪的出版文化？本土书业越来越大的蛋糕中，有多大比例是出自这一块？现代出版业繁荣的背后，是原始森林的消失。以传播文明为天赋使命的书业，不可以明目张胆地反文明。再说，书难道不是用来读的吗？上班族们何以在拥挤的高峰地铁中从容地展读一本异型书呢？这些问题难道出版商没有考虑过吗？

无论是作为读者，还是作者，我对本土书业都没有责任，我的责任感只对应我自己，我只是说出我的耻感而已。但不

可否认，一个国家，有没有一个负责任的出版业，绝不仅仅是出版商单方面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有一份责任。我得承认，作为一个读书人、爱书人，我脑子里常琢磨这些劳什子问题，虽然从没有哪家出版机构给我发工资。

这些问题多数无解，不仅无解，而且问题越来越呈表面化。但无解，并不等于思考本身没有意义。而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意义，就是在思考关于书籍、阅读及书业问题的过程中，邂逅了《独立阅读》。

两年前的一个夏夜，上海的成庆跟我打招呼，说要办这样一个电子刊物。看到作者皆是一群耳熟能详的、在各种刊物上碰鼻子碰眼的分子，有的是京城的熟友，有的则是每月发我稿酬的编辑，我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并立即成了它的作者，至今乐此不疲。两年下来，为它码过多少字，连自己都不清楚，总之应该不算少。我最大的快乐，是看到每期的刊物上，有意无意的，有朋友也在思考类似上面的问题，令我感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作为一份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勾当，我无法要求它为我的文字付酬，但我的收获却是现实的，那就是，它几乎已经取代了N种书评和读书类刊物，成为我购书的第一参考。晓渔君的人文、成庆君的思想和小和君的财经类评介，学术信息高度浓缩，每每成为我掷银子的诱因。

最是“独立”的姿态，引我同情，令我激赏。并非刻意标榜“独立”，但客观上，不为任何机构，“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见独立阅读细则）的写作姿态，确为我们赢得了最大程度的“遗世独立”的“资本”。也只有在这种超然的姿态下，阅读，才有可能回归个人，成为纯然的智力活动，成为身心怡然的“悦读”。

只有一次，实在来不及写新文，捉襟见肘之下，我试图以一篇为某作家新近付梓的散文集写的序文凑数，但遭到成庆和当期轮编汪伟君的婉拒。可天地良心，几乎就在同时，我内心感到某种巨大的不安，仿佛做错了什么一样，也正想撤回文章。但照实说，那篇序文其实是一篇标准的书评，可刊发于国中任何一家书评报纸而无愧色，但它却令我愧对《独立阅读》及其编辑。某种意义上，也不失为对《独立阅读》之“独立性”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吧。

去往公民社会的旅行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北京，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2007年的12月，暴雪肆虐的英格兰北部。我独自躲在卧铺车厢一般局促的卧室里，计划着一次去南部的旅行。启程之前数小时，我更新了一篇博客，内容是关于一家私营旧书店数十年的兴衰往事，然后，我关掉电脑，出发。

从巴士到火车，从火车到长途汽车，再从长途汽车到步行。在伦敦，我像一个土匪般在臭名昭著的“百花园”和大英博物馆横行，完全免费地欣赏了在北京至少需要掏两顿午饭钱才能欣赏的坛坛罐罐，进入英国下议院的顶楼座位观摩布朗首相如何被反对党领袖当众“羞辱”。随后，我在威斯敏斯特外的“红狮”酒吧学着用英语骂脏话，同时干掉一大杯黑啤。我醉醺醺地来到维多利亚车站，登上驶往朴茨茅斯的汽车。傍晚，当我在英格兰南端的一座小镇找到了名叫Miramar的旅馆，或者说J.R.托尔金安度晚年的地方时，我有所顿悟。于是，我买了份晚报，走进一家临街的咖啡馆，挑了个靠窗的位置。

这次短途旅行和阅读没有直接联系，却并非不可比拟。关于阅读与旅行二者多么相似，先贤之述可谓备矣。我准备啰嗦几句的无非是：书就这些，但挑哪些读，怎样读，得由读者一手操办。正如一次自助游，目的地恒定，不过线路和到达方式完全由旅行者定夺。

这或许就是《独立阅读》的旨趣之一。我认识这份杂志，便是在那次旅行之后。

我挑选了一条完全不同的线路回到所居住的那座死气沉沉的工业城。打开电脑，盘算着如何用博客显摆一下沿途拍摄的风景。然后，我从邮箱中发现了成庆热情洋溢的邮件，然后，我从杂志的撰稿人名录中辨认出几位旧时相识，再然后，我按捺不住，决定自己也成为一位“独立”的“阅读者”。

一晃两个年头，《独立阅读》所倡导的理念也由最初那串有点拗口的文字变成了“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这样的美好展望。我十分认同它表现出的愿景和情怀，但我仍然认为，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至少我自己不太愿意别人窥视我的书房。不过，有这么一群人，愿意将自己的思想隐私公开那么一点点，再把这一点光亮用文字汇集、呈现出来。实际上这就是在做一项勾勒思想地图的工作，或者说，是在提醒别的读者，我到过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哪条线路比较有趣，沿途有何等

风景等等。

当然，不愿过于拔高阅读这件事并不表示我把阅读以及建筑在阅读基础上的文字看得像旅游手册那样的粗糙、廉价。相反，阅读与旅行，很多时候对我来说是一回事……

我回到了北京，一个号称中国最有文化氛围、最多“公共空间”的城市。这里有不少读书沙龙，书店也配有咖啡馆或茶室。它们大多身处闹市区，千篇一律，透露着一种令人厌恶的商业气质。身处其中，我感到自己并不是在进行着约翰·伯格式的“自由之旅”，而更像是参与了一场上海大师的“文化苦旅”，这让我浑身感到不自在。我们的时代被隐置于帷幕之后的推手装扮得过于矫情、呆板，缺乏健康社会起码该具备一种活生生的多样性。

没有理由忘记艾略特的教诲，一个人 25 岁以后的写作更多的是凭借一种经验。而对于“公民社会”，我又偏偏因为各种原因缺乏相关的经验。我无法直接体会到什么才是“公民社会”，但至少我可以通过阅读，构建对它的理解和想象。这很可能成了我坚持为《独立阅读》写作最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理由。那就是，在周围没有太多参照物的情况下，尝试着为读者描绘一幅这个时代的阅读地图，以便让他们按图索骥，建立属于自身的时代图景。当然，这个过程也许会很随意、很张扬、很个人化，但正如“多样性”一样，“个人”难道不是公民社会的构成元素之一吗？

有时，我会回忆在伦敦一间从未有过媒体曝光率的旧书店安静读书的日子，回忆在散发着木质香味的酒吧里手持《泰晤士报》与同僚嬉笑怒骂的日子，这样鲜活的经验不可多得。我希望有一天不用出国就能过上这种幸福生活，而在阅读上，我自知无法向这个时代奢求更多的“权利”，但愿自己没有愧对作为一名现代公民在纸上应尽的那点“义务”。

我和“独立阅读”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我是“独立阅读”的外围成员，我和“独立阅读”一直保持着松散的联系（这是否就是一种独立的方式？），尽管“独立阅读”核心成员中的好几位都是我的朋友。通常都是成庆在 msn 上问我最近有无书评，如果有我一般都会老老实实奉上，当然是在纸媒上发表之后。关于纸媒和电子版的“独立阅读”，两者主要的区别在于纸媒提供稿费，但它的好处一般也仅限于此。在我的有时被删节得七零八落的文章旁边，我时常会发现主要是出于“友情”或者“营销”性质的文章，更有甚者偶尔还得被迫和丰胸之类的广告为伍。相形之下，在独立阅读上发表文章则要舒服很多，你根本不用担心你的文章会被大卸八块，以适应那固定而呆板的版式；而且独立阅读的文章水准也整齐很多，大家推荐的书籍多半我也感兴趣，许多时候成为我的购书指南。至于文章质量，高下暂且不论，绝大多数文章都是用心写出来的，这基本的诚意在如今的中国却是显得突兀而耀眼。

按照我的理解，“独立阅读”的出发点主要体现在道德层面——至少它的基本主张表明了这一点。在它创办之初就标明几个简单的规则，比如核心成员不接受出版社赠书，不发表涉及成员所著书籍的书评（有几次我在论坛上看到，因为这个原因，相关的书评和介绍被果断屏蔽）等等。这个出发点显然有它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确，低俗的互相唱和的书评实在是泛滥成灾，和整个中国知识界的惨状（学术和道德水准的双重滑坡）互为印证。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群认真的读书人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的。但是话说回来，这个道德动机在给“独立阅读”带来明显的识别度和关注度之外，并不能给书评本身的质量提供多少有效的保护。就像有许多坏诗和坏小说是人们抱着极端诚恳的态度创作出来的，真诚也可能产生糟糕的书评。以此为基础，见识和风格对书评仍然更重要一点，如果和道德比较的话；或者说道德只是给见识和风格提供了坚实的地基而已，离成就一所漂亮的房子距离还远。

那么，我所理解的独立也许和“独立阅读”宗旨里标明的道德独立有些许不同，如果“独立阅读”里的“独立”二字只是针对那些言不由衷或者低俗捧场式的文章，那么“独立阅读”当然稳操胜券，但难免也有点胜之不武，因为挑选的对手太弱了，简直就是大烟鬼嘛，两拳就躺地下了。我的意思是说，尽管中国目前的批评环境非常恶劣，从最基本的道德层面入手有它现实的意义，但也许也要警觉到道德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最好离它远一点，因为利用和被利用总是在同一个较低的层面上展开。对于低俗的东西，漠视它超越它也许是比直接抨击更为彻底地摒弃。

当然《独立阅读》里一些文章早就超越了道德动机，对于这些文章而言，它们所针对的其实是真正的思想者，是在和

认真的思想者比较之后凸显出来的“独立”，这样的独立也许才是“独立阅读”真正需要彰显的。我们去书店或是网上买到一本心仪的书，我们被吸引，惊叹于作者才思之敏捷，文笔之华美，并以书评的方式表达敬意。可是再好的书，它的荣耀主要还是归于它的作者。对于我们对于读者，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不过是给这位作者提供了思维的演习场而已，在多大程度上，我们在赞赏的阅读过程中能从作者那里将多少养分化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和自己固有的想法产生有机的联系，其实并不确定。一本书，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将它列入好书（比如经典作品）或者坏书（比如大多数的畅销书）之列，可是这本好书是否会对“我”发生好的作用，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也许我们没有任何辨别力地被这本好书全部占领，完整攻陷，甚至使我们丧失自我，匍匐在大师们的脚下，那这本好书至少对于“我”其实是一本坏书，看看书籍曾经造就了多少书呆子就知道它的危害之烈了。大师们固然可敬，可是“渺小的自我”尤其需要我们自己好好呵护。也许正是基于此，富兰克林说过：“要读书，但不要读太多。”同样，叔本华也对此类以阅读替代自身思考的“懒惰行径”提出过尖锐批评。阅读只有在有助于我们自己的思想成形的时候，它才是真正有益的，而思想上“独立”的态度，则是确保它不致于走样的前提。在此意义上，“独立阅读”的空间还很大，它要走的路还很长，我愿意和它共勉。

分享

特约撰稿人 陈丹丹（南京，cheryl@live.cn）

从来不擅长命题作文，但此番为《独立阅读》庆生，我还是打心底里高兴的。想来 07 年秋，这份刊物创办不久，机缘凑巧，我以译者的身份参与进来，直到现在。其实懒散如我，通常只在月底催稿的那几天才开始翻译、审校或短或长的书评。而每月的定时磨冶，与翻看成品的喜悦，总在不断提醒我这个团队积极、理想的氛围。

旅居各地的撰稿人们探索不同的语种，分享新鲜的经历。对比《独立阅读》的各种文体，口径虽有大小，无一例外的是观点与视界的鲜明。报告就一个月来某个主题类别的书籍综述，书评针对单品书或者一两本的对比，译介则是某一篇文章，有时谈论文化现象，更多的是书评。同是衍生品，翻译自然与文本贴得最近。即便如此，它也是阐释的一种。译者在遣词造句的斟酌中固然努力传达作者的想法，但也不可避免的注入了自己的理解。选择此文而非彼文译介，更是趣味的体现。

《独立阅读》的选稿有相当大的自由度，我可以遴选自己感兴趣的文章，也会接受编辑的推荐。基本的想法是与公众分享平日阅读中有意思的发现。原作者的观点我不一定赞同，但只要里面有新鲜的、闪光的东西，我愿意整篇介绍过来，希望能给读者以启发，也交由读者评判。太多的时候，我们是在洋洋文海中寻找材料佐证自己的论点，这样有导致自我封闭的危险。有时候需要“上来透口气”——倾听不同的声音，接受无论是思想还是审美的“刺激”。而这些“刺激”会打开一扇扇门，通往对他人和社会的新的认知。这便是阅读开放的品格。

而阅读同时具有的私人性又使得每翻开一本书，都是在经历一场精神的自助旅行。摘不掉的有色眼镜使得每一次阅读都成为独一无二的经历。借助文本，我们从狭小的周遭进入广阔的未知天地，而合上书的霎那（可以不必读完，只是停下来一阵：思考、联想、笔记），又一次返回自身，完成一次关照生命的循环。此间的感触很多是无法传递的，可是如果把能够传递的那部分记录下来，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分享，精神上的愉悦无疑会放大许多倍。

《独立阅读》正是一个难得的交流平台，虽然作者们的关注点各异，但都认可独立但不中立的精神，为“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进行有质量的写作。刊后热情的编读往来与论争也印证了这个平台上的交流并非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而是开放的、公共的、独立的。它能走到今天实属不易，我希望它还能更好地走下去。

不过说到底，这份薄薄的电子刊物也只是一群人用心经营的一件小事而已，没有必要赋予太多意义。只是想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总有人在为这样那样的小事不计回报地坚持，我的内心便踏实了许多。

有一搭与没一搭

特约撰稿人 罗四鸽（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日全食初始时，我刚下火车，冒着瓢泼大雨，穿梭在积水的异乡马路上寻找着公交车，却一眼瞥见一位手拿观测眼镜的小贩，垂头丧气地站在站牌下，怔怔看着越来越黑的天和越来越大的雨，脖子下吊着一大袋观测眼镜，这我不禁有些幸灾乐祸的快感，也让我再次认识到，我对日全食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有些厌烦。

一个星期来，日全食三个字不停轰炸我的耳朵，充斥我的眼睛，让我几乎被迫喜欢上它了，甚至有好几次以此为话题，和几位不生不熟的朋友聊得天花乱坠，如数家珍似的说出此次日食从西藏到上海自西向东所经过的 12 个省和最佳观测时间，以及关于日全食的一切，好似一位狂热的天文爱好者。而实际上，我不是。我甚至不会在夏夜美丽的星空下，仰头去看一眼北斗七星，更找不到有着动人传说的牛郎织女星。就犹如此次，一件小事让我完全忘记了此次五百年一遇的日全食，而抱怨着它所带来的交通不便。然而一小时后，面对几位不生不熟的朋友，我又恢复了对日全食的所有兴趣，甚至表现出莫大的遗憾，一种莫名的强大力量指使我，让我如流地背出媒体上的话。说完，一阵空虚与茫然。

正是这种空虚与茫然的感受，让我喜欢上《独立阅读》。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功利的事情，犹如范进中举。不为别的，只为改变命运。待终于认为自己可以不功利地去看一本书时，却发现自己已经失去了某种能力，陷入更大的被动之中。至今，我依然受到某种力量的支配，不由自主地去买一些书，然后对这些书不由自主地发表一些不是自己的意见。这让我有时非常尴尬，尤其是当有人诚心诚意让我这位中文系的学生推荐一些书给他时，我只得沉默或是顾左右言其他。实在推托不过，便说几个最近火爆的书名，然后人云亦云一番。说完，便是空虚与茫然，并感到羞愧。

只是现在，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时不时看看《独立阅读》，然后学着用自己的腔调说自己的话。虽然说得非常不好，但我很骄傲；虽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但有了这一搭，对我而言，似乎是真正读书的开始。

为交流而写作

特约撰稿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有一度我常常考虑这些问题：读书有没有用？有什么用？怎么发生作用？读书是为了什么？

真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没有正儿八经读过几本书，也从来没有被这些问题困扰过。虽然课堂内外的教育，不足以让年轻人的头脑变得明晰，也不能给他一个立足点，让他在思考和判断时作为凭靠，但胜在有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从班会、社团、奖学金、党团活动到毕业文凭，后来还有学费和就业的压力，足以让多数人安分守己地度过大学时代。一旦离开那个环境，学校教育在价值和方法两方面的失败就显露无遗；不仅失败，后来还要花费许多时间，来清理和检验那些似是而非的方法和貌似正确的知识。

和接受相比，清理的难度更高。因为接受的时候年纪小，头脑单纯，真正两耳不闻窗外事，称得上简单高效；清理的时候已经年纪日增，诸事来逼，一心多用，更何况取舍之间还有利弊得失要权衡，让人纠结得很。从技术的角度说，接受的时候越是一张白纸，清理的时候两种知识越容易打架。个人的见识难免有限，加之专业、学科和职业的约束，每当头脑里左右互搏的时候，如果不是天才，大概都有过打迷墙、绕圈子、捅不破最后一层窗户纸的困惑。

知识是交流而不是灌输的后果——果然——但是到哪里、去和谁交流呢？

知识有两种。一种指向个人的内心体验，与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恐惧安乐有关，是个人性质的、不可替代的知识；另一种知识——不管是关于自然还是关于社会，则有若干普遍适用的原则，即所谓“方便的假设”，作为人们讨论和交流的前提。前一种知识强调体验，后一种知识强调交流。人生忧患识字始，对后一种知识，最大的烦恼是你识字又乏人交流，似有所得又难以验证。时间久了，就会反过来生出这样的疑问：读书有没有用？有什么用？怎么发生作用？读书是为了什么？

如果没有互联网，这种困惑一定会持续更长时间。互联网不仅使更多知识变得可及和易得，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人的连

接和聚合，使交流和讨论成为可能。这为第二种知识的传播与创造提供了新机会，也部分地解决了我的个人疑难。

我和成庆、晓渔都在上海生活，但先在网上认识，有一段时间文字上的交往之后，才相约到季风书店碰了次面。这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特别经验，而是近 10 年来日渐普遍的现象。借助于互联网上的开放的技术平台，交流的低成本变得更低，也更有成效——操办《独立阅读》就是一例。

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造纸和印刷技术的革命性后果当中。纸面印刷革命的所有后果中，以知识的扩张最为重要。新发明、新技术、新思想和新制度得以传播，得以实验，得以检讨和改进，这增进了人类的福利。互联网技术延伸了纸面印刷技术的革命成果，扩展了知识生产和交流的空间，而它的连接和聚合功能，又强调了知识的公共价值。

首先作为《独立阅读》的读者，有时候会考虑这个问题：免费为这个电子杂志撰稿的作者，风格不同，关注的领域也不一样，有什么动力让他们继续工作下去呢？

就我个人而言，撰稿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用文字的形式继续清理头脑，二是从交流中检验所得。这份电子刊物追求的性格，已经在刊名中体现出来了，最近强调的“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都和我的想法接近。如果有一天，这份电子刊物偏离了“独立”和“常识”，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在此之前，尚值得勉力维持下去。

虽然作者倾向接近，但《独立阅读》算不上一个同人刊物，而是被“共同编辑”的互联网技术所集合起来的分散的个人工作。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连续出版的刊物，为了将它支撑下去，有很多日常的工作要做，特别是对撰稿人的勤奋有更高要求。在这一点上，我自感惭愧。这里向每期撰写报告的朋友和兢兢业业的助理编辑李伟为表示敬意和谢意。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 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主页：<http://chinairr.com.cn/>